全球對話 10.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17種語言刊出

與 Raquel Varela 談社會學

Christine Schickert

阿雷格里港的第四期ISA論壇

Geoffrey Pleyers, Jacob Carlos Lima, Hermílio Santos, André Salata, Emil Sobottka,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Priscila Susin,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Izabelle Vieira

歐洲國家的社會政策

Maria Petmesidou, Ana Guillén, Emmanuele Pavolini, Daniel Clegg, Roland Atzmüller, Sigita Doblyte, Aroa Tejero, Silke van Dyk, Tine Haubner, Beatrice Carella

數位化的挑戰

Paola Tubaro, Lévio Scattolini, Felix Sühlmann-Faul,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理論觀點

Donatella della Porta

悼念 Samir Amin Immanuel Wallerstein

Vishwas Satgar, Sari Hanafi, Stéphane Dufoix, Frank Welz, Anand Kumar

開放論壇

> 移民露營車的遷移策略

> 紐約水牛城：難民安置的典範

MAGAZINE

GD 第10卷 /第1期 / 2020.04

http://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 主編的話

在本期的訪談中，勞動歷史學者Raquel Varela回顧了發生於1974年4月的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他探討了為何要「由下而上」述說世界的重大事件、討論勞動階級的視角及貢獻，並提及革命殘留在葡萄牙的社會及經濟影響。

在2020年7月，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者及社會科學家將齊聚巴西阿雷格里港，參加第四屆國際社會學會（ISA）論壇，討論彼此的研究，以及21世紀社會變遷的四大挑戰：民主、環境、不平等、交集理論。論壇會長Geoffrey Pleyers在他的文章中強調分析這些社會發展之間相互聯繫的重要性。巴西社會學會（SBS）會長Jacob Carlos Lima向大家簡介該社會的歷史，並籲請社會學界，在面對當前該國政治發展及衍生的社會困境，能夠互相支持及團結。來自論壇在地組織委員會的Hermílio Santos、André Salata和Emil Sobottka，以及六位巴西年輕學者，向我們簡介了巴西歷史及社會學。

基於近年歐洲福利制度的系統性的崩壞，新型態的社會政策被設置，並且不僅在特定領域挑戰了不同國家，還挑戰了歐洲和歐盟的社會支柱。在首次針對此議題的座談會上，學者們展示了他們對當前軌跡、歐洲國家面臨的挑戰所做的研究。

第二場座談會討論了這個世代最重大的議題之一：數位化社會，檢視它對勞動、金融市場的影響及其永續性。座談會上也提到研究者如何對平台經濟在維護、創造工人權利及合理的工作條件上做出貢獻。

Donatella della Porta在他的文章中鋪排了當前社會運動相關研究所面臨的挑戰。他認為，世界各地持續進行中的抗議活動，將新問題放進了討論議程中，但也要求用新的方式去分析它們。他主張將資本主義和階級重新作為分析範疇，帶入社會運動研究中。

兩位重要的社會科學及政治思想學者，Samir Amin (1931-2018)和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去世了。針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解練和批判，Amin的戰略構想影響了全球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科學學者。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分析概念深刻地豐富了社會學理論。作為ISA前任會長，他在新舊成員之間建立了蓬勃的交流，影響遠至今日。這兩位傑出人士的同事及朋友們會牢記並榮耀他們的成就及人生。

開場的兩篇文章處理美國的移民問題：Veronica Montes研究了所謂的「移民大篷車隊（migrant caravan）」，成為那些希望從拉丁美洲移民到北部的人所採取的策略性選擇。Aysegül Balta Ozgen向我們介紹了美國中型城市（如紐約州水牛城）的難民重新安置所帶來的挑戰及效益。■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17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Assistant Editors: Johanna Grubner, Christine Schickert.

副主編：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 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區域編輯

阿拉伯： (Tunisia) 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 (Algeria) 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 (Morocco) 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 (Lebanon) Sari Hanafi.

阿根廷：Alejandra Otamendi, Juan Ignacio Piovani, Martín Di Marco, Pilar Pi Puig,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Haque Khondker, Hasan Mahmud, US Rokeya Akhter, Juwel Rana, Toufica Sultana, Asif Bin Ali, Khairun Nahar, Kazi Fadia Esha, Muhaimin Chowdhury, Helal Uddin, Md. Eunus Ali, Mostafizur Rahman, Jhilik Saha, Maria Sardar, Tahmid Ul Islam.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Lucas Amaral Oliveira,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法國／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Sandeep Meel.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Faezeh Khajehzade.

日本：Satomi Yamamoto.

哈薩克：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波蘭：Adam Müller, Jonathan Scovil,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leksandra Wagner, Sara Herczyńska, Monika Helak, Aleksandra Senn, Weronika Peek, Anna Wandzel, Zofia Penza-Gabler, Justyna Kościńska, Iwona Bojadżijewa.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Diana Alexandra Dumitrescu, Iulian Gabor, Bianca Mihăilă, Alexandra Mosor, Mioara Paraschiv, Maria Stoicesc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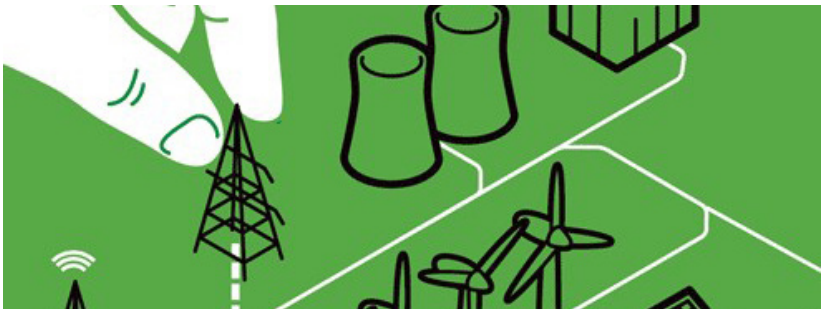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Valentina Isaeva.

臺灣：李宛儒, 林玟圻, 呂道詠, 洪柏勝, 黃昱閔.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第四期ISA社會學論壇將在2020年七月於巴西阿雷格里港舉辦。論壇會長Geoffrey Pleyers、巴西社會學協會會長Jacob Carlos Lima、當地組織委員會以及六位年青學者將會帶我們深入地了解巴西的社會學。

由於歐洲社會福利國家系統性地解體，歐洲國家的社會政策已成為社會學研究以及政治行為的關注焦點。在這場討論會所涵蓋的文章中，研究者將呈現歐洲福利國家如今面對何種挑戰、其有何發展軌跡。



數位化將會、且正從根本上改變社會。此部分的文章檢視了數位化對於勞動、商業市場、永續性的影響，也探討研究如何能幫助平台經濟的勞工維繫其權利以及公平的勞動環境。

GD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談論社會學

葡萄牙革命的遺緒：Raquel Varela 訪談
Christine Schickert, 德國 5

> 阿雷格里港：第四期ISA社會學論壇

21世紀的四大挑戰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8

當SBS迎來ISA論壇
Jacob Carlos Lima, 巴西 11

簡評巴西社會學界
Hermílio Santos, André Salata, Emil Sobottka, 巴西 13

制度化童年的敘事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巴西 15

社會救助作為政府部門：巴西的案例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巴西 17

愉港女性的都市居住抗爭
Priscila Susin, 巴西 18

巴西勒西菲市針對暴力行為的非正式治理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巴西 20

巴西的職業不平等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巴西 22

里約熱內盧中產階級的發展歷程
Izabelle Vieira, 巴西 24

> 歐洲國家的社會政策

經濟緊縮：醫療照護的普世性原則會被妥協嗎？
Maria Petmesidou, 希臘 , Ana Guillén, 西班牙 ,
Emmanuele Pavolini, 義大利 26

新零工紀元的失業救濟金
Daniel Clegg, 英國 28

走向對立的社會：當社會政策開始注重主體性
Roland Atzmüller, 奧地利 30

南歐對家庭政策的支持
Sigita Doblyte , Aroa Tejero, 西班牙 32

德國的志願服務：做善事還是影子經濟？
Silke van Dyk , Tine Haubner, 德國 34

歐盟會維持其社會支柱嗎？
Beatrice Carella, 義大利 36

> 數位化的挑戰

人工智能是「誰的智慧」？
Paola Tubaro, 法國 38

新奇博物館
Lévio Scattolini, 巴西 40

永續的數位化社會需要的是什麼？
Felix Sühlmann-Faul, 德國 42

公平工作組織：零工經濟的行動研究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英國 44

> 理論觀點

資本主義、階級、爭論
Donatella della Porta, 義大利 47

> 悼念

向非洲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Samir Amin致敬
Vishwas Satgar, 南非 51

I. Wallerstein: 一個傑出的社會學家、知識份子
Sari Hanafi, 黎巴嫩 , Stéphane Dufoix, 法國 53

I. Wallerstein：使社會學重新團結
Frank Welz, 奧地利 , Anand Kumar, 印度 55

> 開放論壇

移民露營車在中美洲的遷移策略
Veronica Montes, 美國 56

紐約州水牛城：實踐難民安置的典範
Aysegül Balta Özgen, 美國 58

「歡迎蒞臨在巴西的第四期ISA論壇，我們期許你努力爭取自由、民主與社會正義。若無自由，將無社會學的可能。」

Jacob Carlos Lima

> 葡萄牙革命的遺緒

——專訪 Raquel Varela

Raquel Varela 是一位葡萄牙里斯本諾瓦大學(NOVA University of Lisbon in Portugal)的歷史學家。她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的勞動史、社會福利、二十世紀葡萄牙與歐洲歷史，以及社會運動史。她同時也是全球勞工研究聯盟(Network for Global Labor Studies)的共同串辦人，以及跨國罷工與社會衝突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Strikes and Social Conflicts)的會長。

她在《葡萄牙革命人民史》(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Portuguese Revolution，2018)這本著作中，講述了葡萄牙在1974年的康乃馨革命。為此，她呈現反殖民運動在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葡萄牙的工人、女性與藝術家如何參與其中。

以下是由德國傑納佛里德希席勒大學(Frie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的 DFG後增長社會研究小組行政主任、《全球對話》助理編輯 Christine Schickert 與 Raquel Varela 進行的訪談內容。

Raquel Varela.
來源：Veríssimo Dias.

CS：四十六年前，也就是1974年的四月，葡萄牙的獨裁政府遭到一場軍事政變終結。政變發生的如此快速，是因為軍人們對於葡萄牙政府在其殖民地發動的戰爭感到不滿。你可以和我們聊聊，在戰爭當時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情況嗎？是什麼使得軍方對於政府的領導感到失望？

RV：葡萄牙在當時是一個極度落後的國家。舊帝國和衰落的帝國為了在一場耗時十三年的慘烈戰爭中對抗反殖民革命勢力，在1961至1974年

>>

間動員了超過百萬民年輕男性，戰火的後果就一直延續到那個時候。殖民戰爭之所以會失敗，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解放運動，特別是在幾內亞比索由一位被遺忘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 Amílcar Cabral 所主導的運動。

激烈的解放運動以及長期的抗戰讓一些軍人——主要是中階軍官，而不是將軍或士兵——意識到戰爭不應該繼續下去，而只有透過政治手段才能結束這場戰事。他們於是在1974年四月二十五日組織了一場政變，政變的指揮官是 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他們擊敗了當時的政權，並罷免了獨裁者 Marcello Caetano ，但他們叫人民待在家裏不要出門。不過人民沒有聽從他們的命令，反而走上了街頭。

讓殖民地的革命顯得格外有趣的是，這是第一次第三世界國家說要發生的，最後真的發生了：動亂從殖民地蔓延到市中心、蔓延到大都市，1975年之後又回到殖民地。獨裁政府的解放從最初的一場血腥戰爭，轉變為里斯本的街頭派對。這場歐洲在戰後以來最激進的革命歷時十九個月。這場比起1968年三月還要激進的革命，是歐洲戰後時代的最後一場革命，也是最後一次對於私有財產制抱持質疑態度的革命。

CS：我想先聚焦在當時軍方叫人民待在家裡，但他們卻沒有這麼做的這件事情上。可以請您和我們再多談一些細節，還有當時人民的處境嗎？他們為什麼會在這次革命中站在軍方那邊？

RV：葡萄牙當時已經經歷了長達四十八年的獨裁統治，而且還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 。在1961到1974年間三方之間的殖民戰爭動員了超過百萬人。就比例上來看，這場戰爭中傷亡的葡萄牙人比在越戰中喪生的美國兵還要多。而為了逃離戰火和貧困的環境，很多人選擇移民，特別是移民到歐洲的其他國家。從1960年開始，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離開。當時的葡萄牙還是世界上兒童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女人的信件甚至會被她們的丈夫拆開來看。

葡萄牙當時是個有九百五十萬人口的國家，然而在1974年五月一日，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日的一個星期後，有兩百萬人站出來慶祝五月的第一個日子，除了要求像是廢除獨裁體制等民主變革之外，也提出了革命性的社會需求，例如最低工資、週休二日、夜班加薪、男女薪資平等。在葡萄牙革命期間，有三百萬人參與了工會、鄰里組織、市議會或學生會的活動。這場革命不只發生在對革命過程而言最重要的工業領域，各種產業的人都加入了，例如服務業。所以當時的醫院被醫生佔領、學校被老師佔領。由於康乃馨革命發生在二十世紀晚期，葡萄牙的服務業已發展一定程度，有大量的服務業勞工，而這些人都是革命的一員。

CS：接下來我想針對您提到的另一點提問：您說葡萄牙的這場革命是最後一個觸碰到財產議題的……

RV：有六百個公司被佔領，變成自我管理或某種形式的合作社，由工人控制空司的模式被引入更大的公司，而銀行被國有化、徵收，並且沒有給予銀行業任何補償。資產階級其實在資產被徵收的幾個月後就逃到巴西去了。雖然接下來要說的這件事只是個反事實分析（在歷史學中我們不會用「如果」這個詞——我說這句話是以事實為根據的），但在我看來，上述事件導致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推行被延後了十年。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型態直到革命之後才被引介至葡萄牙，原因在於那時候美國總統 Gerald Ford 以及其政府團隊擔心葡萄牙可能會成為紅色地中海的開端。所以說，葡萄牙革命顯示了，就如馬克思所言，對工人階級而言，經濟危機並不必然是一場災難，反而能被他們轉變為一場國家的政治危機，來反抗主要的統治階級。

CS：說到人民，你將你的著作命名為《葡萄牙革命人民史》 。這麼做的動機是什麼？為什麼會想用這樣的方式描述書的內容？

RV：這之中的原因當然包含了「底層歷史」以及英國在1960年代的社會史，更直接地說，是受到一位美國的歷史學家與思想家 Howard Zinn 的影響。那時候有這麼一個想法，認為我們必須為那些投身於抗爭的、付出血淚的人民，為關於反抗的歷史寫一份編年史。我們必須將不只是立法機關和政府的歷史納入，還要把人民的歷史、同樣參與歷史過程的無名的多數、工人反抗等等，這些底層的歷史也寫下來。這些事物都是構成歷史的一部分，對於完整地理解歷史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於工人階級對於自己能做到什麼事情通常不太有概念，工人階級曾經發起了什麼

>>

行動、在某些時刻如何強大、如何改變了世界，甚至改變自己，呈現歷史中這些特殊的時刻、將關於人民及其行動的歷史寫下來便顯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在談論的是一個，在1974年前有四十八年都是歐洲國家中最落後的、卻在那之後的二十五年間躍升為擁有全球第十二名的國家健康福利的國家。這樣的現象只有通過巨大的集體力量才可能實現。

關於葡萄牙革命，同樣很有趣的一點是， 這是史達林主義的做法首次受到左派的質疑。在1968年五月的運動就已經出現對史達林主義者在法國大工廠霸權的質疑，然而在葡萄牙革命中，這樣的質疑更加強烈。那些所謂的極左派，或說共產黨中的左派，在領導工會以及聯合工會、不管是工業或服務業部門的抗爭中，都握有很大的權力。

CS：讓我們談談葡萄牙革命的後續吧：不管是在政黨層面還是運動層面也好，這些重組的企業以及對於財產歸屬的質疑、挑戰，是否仍然能反映在現今的政治局勢上？這與2008年後葡萄牙處理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帶來的影響的方式有沒有關係呢？

RV: 財產關係最後的轉變，其中之一是一直持續到後troika時代對於住屋價格的控制。在葡萄牙金融危機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德國／歐盟在談判葡萄牙經濟調整方案時提出的要求之一，便是要將居住市場自由化，而這對於貧窮和中產的勞工階級都有著劇烈的負面影響。這場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中，持續最久的是至今依然持續著的，對於極右勢力的反抗。

CS：是的，這確實是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觀點：在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葡萄牙與歐洲其他國家不同，並沒有發展出強大的右翼政黨。您可以解釋這和葡萄牙革命有怎樣的關聯嗎？

RV：這的確是革命造成的結果之一。這場革命並不只是朝向民主的進程，而是一場清理國家機器，並將右翼政權的領導從中消除的革命；葡萄牙與右翼明確的決裂。如今葡萄牙已經沒有極右派的文化與行事作風。這樣的情況當然可能會改變，然而至少當經歷革命的世代還活在世上，我不認為葡萄牙會有出現極右派的可能。這當然也意味著我們並不能確定未來十年會發生什麼事情。■

來信請寄至 Raquel Varela
<raquel_cardeira_varela@yahoo.co.uk>

> 21世紀的四大交互挑戰

Geoffrey Pleyers,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ouvain, 比利時, 第四屆ISA社會學論壇會長及ISA研究副會長 (2018-22), ISA宗教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前會長 (RC47), ISA宗教社會學研究委員會委員 (RC22), 青年社會學 (RC34), 社會運動, 集體行動與社會變遷 (RC48)

在2001年一月，來自各大洲的兩萬名運動者及知識份子聚集在阿雷格里港，參加第一屆世界社會論壇。他們集結於此，是期望著二十一世紀將比起以往更民主、國際之間的團結與全球各地的抗爭能夠將全球化的進程推向更平等與更公平的方向。

在將近二十年之後的2020年七月，五千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科學家將會來到同一個城市並加入 ISA Forum of Sociology，以分析社會變遷、分享他們對於本世紀四大挑戰的研究與觀點，以及社會科學如何幫助我們應對這些挑戰。然而這一次集結的社會背景與氛圍將會與前一次相當不同，千禧年的樂觀態度已經消退、人類共同生活於一個資源有限的星球上而面臨的困難也比過去更加緊迫。

民主、環境危機、不平等、 交織性，這四大挑戰在近二十年來，尤其是近五年來，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千禧年之際，民主的深化與擴展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黑人運動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被評析為「第四波民主浪潮」。然而，即便2010年代開始於各地民主運動的展開，卻結束於反自由領導者的出現，威脅著民主、環境、包容、兩性平等的價值。與此同時，人們對於更加民主的全球化治理能夠處理氣候變遷、移民、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等等議題所抱持的期望，也逐漸破滅。如今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面對這些挑戰，民主必須在代議制度之外創造新的模式。

>>

這十年之間,超級富豪與其他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已開發」國家的貧窮指數不斷增長,無論是那些如美國和德國等經歷了至今以來最長經濟成長時期的國家,或是那些經濟及社會福利狀況受到緊縮計劃重創的國家。在這十年的後半段,環境災害、性別暴力與種族主義這兩個議題再次受到重大關注。身處全球南方的婦女站到了捍衛民主、譴責父權主義的前線,如三月八號罷工、#NiUnaMenos和#MeToo運動等等女性主義的動員活動,也使得性騷擾和謀殺女性成為新聞頭條、日常生活以及大學校園中的焦點。青少年的罷課活動也讓氣候變遷與環境災害受到全球的關注。受到全球南方運動深刻的影響,他們進而推展更為整體性的生態願景,並訴求必要的系統性變革。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最新一期的報告中就指出,除了生物大規模地滅絕,二十一世紀氣候變化的數據也令人擔憂。

> 交互的挑戰

社會運動以及社會科學在這個世紀的前二十年教會我們的,是這四大挑戰是難以分開來討論的。民主、環境危機、不平等、交織性之間逐漸增長的連結,迫使我們必須以四者之間的交互作用為出發點,重新審視並理解這些概念。

舉例而言,考慮到環境危機、不平等和交織性可以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民主。一方面,越來越多國家的民主受到反自由主義領導者的威脅,他們拆解了人權、多元性、對公民的平等尊重等等基本價值,並且助長了父權體制、種族歧視、不平等,以及跨國企業加劇環境破壞的行為。另一方面,進步運動也挑戰了制度性民主,他們認為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主體制不夠完備,對此訴求政治、文化與社會上的改變與實際的行動:例如針對全球暖化與環境破壞提出具全球規模的應對方式;在當前父權文化下的親密關係與日常生活,提出對於性暴力和女性謀殺的解決手段。

不平等現象的崛起對於民主及環境而言都是個相當大的威脅。全球性不平等的現象已經嚴重到,那些前百分之一富有的人和跨國公司在國家與國際之間都有著重大的政治影響力。與Michael Walzer 提出的「領域分離(separation of the spheres)」的民主理想相去甚遠的是,過去十年,有一些國家出現了億萬富翁當選總統的現象,政治和經濟精英之間的勾結以及倡議團體的主導權已成為許多當代政治政權的核心特徵。

氣候正義運動與社會學家都指出,氣候變遷和大自然的破壞本質上來說是一個社會問題,若不對社會進行重大的變革,這些問題便無法受到減緩。其原因在於當前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以及其對於自然資源越滾越大的貪婪。雖然地球是人類共同的家園,我們對於環境災害要負的責任卻有很大的差異。樂施會計算出的人最富有的1%的人均生態足跡是最貧窮的10%的175倍。此交互取向和環境正義運動向我們顯示,即便婦女、少數民族和較不富裕的人導致的地球破壞較少,他們卻付出了更高的代價,例如預期壽命的降低和氣候難民的出現。

如何克服長久以來的、相互交織的經濟、種族、殖民、性別歧視以及使其延續的暴力,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另一個重大挑戰。黑人女性運動者、原住民運動以及社會科學家揭示了種族、階級和性別的交互性,這樣的特性造成了重疊且相互依存的歧視與弱勢體制。交織的觀點導致了對於民主挑戰、不平等以及環境正義的重新審視。現況下的代議制度在處理種族主義和父權體制的壓迫方面已經顯示出其局限性。不平等與性別和種族主義的歧視是密切相關的,環境災害與全球暖化造成的傷害之間的關係也同是如此。對於交織性的意識不斷提升,既觸發了次要行動者與社會運動的興起,同時也是其產出的結果。原住民族群、少數民族、女性主義者、小農透過實踐、社會抗爭以及另類的世界觀來抵制不公正。

對於關注社會政策以及經濟成長的、較激進的運動者而言,性別時常被認為是一個次要的議題 。然而此議題在今日為了尋求全球民主而進行的戰役中卻有著核心的地位。在2020年,有色以及少數民族背景的女性是反自由和專制政權下的第一批受害者。她們同時也站在21世紀捍衛、重構民主的前線。她們為一個理想的世界鋪平了道路,在這個世界裡,主體之間的關係、同情心、團結和對自己、他人及自然的關懷將重塑我們的經驗,以及我們對於共同生活於資源有限的星球上的理解。

>>

然而，將所有受壓迫的行動者都與生態的復興聯繫起來，其實是一種誤導。雖然女性主義者與原住民運動處在生態抗爭的前線， Arlie Hochschild 針對路易斯安那州的環境災害受害者進行的研究，則顯示這些受害者如何成為反動以及種族主義的立場在政治上的基礎，並直接對我們的民主體制與環境造成威脅。這提醒了我們，面對這些環境挑戰的方式，與我們的民主未來之間有著深刻的關聯。

將這四個挑戰聯繫起來後可以發現，它們深植於權力關係、社會結構以及現代文化、主觀性、世界觀和社會科學中。我們清楚地知道，這四者是無法被當作不同的挑戰、分別的需要、或獨立的研究領域來處理的，我們不可能在解決其中一個的同時不去面對另外三個。它們共同構成了拉丁美洲學者所說「文明危機」的整體。

> 2020年ISA論壇：共享研究分析的機會

2020年的ISA論壇使我們得以分享對於這四大挑戰以及他們之間關聯的分析，並討論因這四大挑戰而出現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與應對這些挑戰的行動者的關係，以及社會學面對這些挑戰的貢獻。我們的學科如何因這些挑戰與從中湧現的行動者而轉變？將行動者作為知識生產者考量進來，將如何影響我們採用新的認識論？創新社會分析如何對於我們在全球化紀元理解、解決共同的挑戰做出貢獻？我們主要需要克服的難關為何？民主、生態、不平等、交織性等概念如何因近年的經驗、行動者與挑戰而重新受到重視？他們如何成為21世紀的進步與反動戰場前線的主要角色？

進入這個世紀二十年以來，硬科學與社會科學都顯示，我們正處在應對大多數挑戰的十字路口。人類在下一個十年間面對這些挑戰的方式，將會影響人們在接下來的整個21世紀中的生活。 ■

來信請寄至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 當SBS迎來ISA論壇

Jacob Carlos Lima, Federal University of São Carlos, 巴西, 巴西社會學學會主席，ISA工作社會學(RC30)研究委員會委員。

2017年是巴西社會學協會(SBS)創建的第70週年。此協會創立於1937年，當時命名為保利斯塔(Paulista)社會學協會。實際上是到1950年才正式組成了巴西社會學協會，並加入了當時新創立的國際社會學協會(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由於SBS其特定專業領域下的政治與組織性特點與大學的專業幾乎完全重疊，協會在1937至2017之間並不是持續運作。在1950年重新組織後，SBS於1954年在聖保羅招開了首次的巴西社會學會議。此後，1964年時的軍隊政變使社會學界受到了重創，也牽連使許多社會學教授與學者進行強制退休。直到1985年的民主化過後協會才重建完成。從此之後，協會每半年舉行一次議程，照常運作。2019年第19次會議舉行在弗洛里亞諾波利斯(Florianópolis)。

SBS在最初的十幾年伴隨著社會學、政治、社會科學等科目在大學課程中的建立，最早是在1933年的聖保羅市開始。到1964年時，已有19個相關課程被不同地區的大學採用。此外，也有兩個研究所課程被聖保羅市地區的大學採用。

在這段期間內，不論是社會學的研究作品數量，或是對於社會學使否能作為一種科學的質疑都在增加中，但研究上的主題仍侷限在聖保羅市中。而在此時，軍隊的獨裁對於科學與科技自治的重視，偶然地促使社會學與社會科學的擴張；研究的制度化與研究生的產生機制，導致了大學與研究生教育在國內的增加，促使了1970年代社會科學協會的成立與相關會議的舉行還有科學知識的傳播。由CAPES(支持與評估大學教育的巴西邦聯機構)針對大學生計畫的評估機構指出，博士程度的學位是任職公立大學、獲得研究基金不可或缺的條件之一，而這也立定了國家學術研究的品質基礎。

在民主化後，這種學術的擴張受到鼓勵學術發展的政策更加地提升，鞏固社會學成為一種學術訓練及研究領域。同時，在國際化的趨勢下也使得巴西的社會學界在國際上亮相。在2006年，這種訓練成為高中的必修科目，擴展了市場中社會學家的人才需求。必須強調的是，這種需求只出現在高中以上的教育體制中；相反地，在其他類別的工作中幾乎是沒有這種需求，因為大部分的社會學家不是被公部門聘用為社會計畫的科技人員，就是於NGOs或私人企業這些同樣是人文系所畢業的大學生工作的地方工作。

然而，這些協會所達到的里程碑，卻受到2016年時俗稱「國會政變」的事件威脅。社會學這個學科受到統治者們針對效益與實用性上的質疑。不論是大學或是高中，研究經費等許多方面都受到了干涉。近期，社會學被指控正在宣傳

>>

日落時的阿雷格里港。Felipe Valduga攝。保留部分權利。

一種會威脅到巴西家庭關係的模糊文化馬克思主義(cultural Marxism)。

在這些令人擔憂的現況下,這些指控還在持續增加中,而社會學並不是唯一一個被指控的目標。2017年,在一次倉促的高中課程更動中,社會學跟哲學一同被降級為選修科目。極右派政府接著在2019年將矛頭指向這兩門學科,認為公立大學應該以「實用性」為優先出發點去開課,例如獸醫相關的課程;而那些想去專研社會學、哲學的學生應該去就讀私立大學。針對社會學及哲學的大學、研究所課程集中的公立大學,相關的指控開始蔓延並普遍人心。指控者不是認為上這些課程是在浪費錢,就是認為這些大學是政治反對抵抗力量的所在地。

SBS還有其他巴西的社會科學界,像是巴西人類學協會(ABA)、巴西政治學協會(ABCP)、巴西科學學會(SBPC)一直以來都在努力抵抗政府以財務調整為由而行使公權力施加的干涉政策。自1990年代以來,類似的政策在許多國家導致了社會與政治上的噩耗,像是2000年的阿根廷或是2010年的希臘等。

在這個脈絡下,在巴西舉辦的IV ISA論壇展現了一個我們對這些攻擊做出抵抗的額外場域,這不僅是為了社會學知識的存續,也是為了與粗鄙、未開化的心智(barbarism)而戰。這種未開化的心智不只是伴隨著帶有崎嶇思想的宗教基本教義主義(religious fundamentalism),還有與共和體制共謀的獨裁主義(authoritarianism),這些本應當守護民主的價值,但顯然地這些思想對於民主沒有多大的信心。

我們歡迎所有志同道合的人。在這場為自由、民主、社會正義奮鬥的過程中我們需要你們的支持。因為沒有自由的話,就不會有社會學的出現。■

來信請寄至 Jacob Carlos Lima
<jacobl@uol.com.br>

> 簡評:巴西社會學界

Hermílio Santos,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會學論壇的地方委員會主席, 傳記與社會 (RC38), **André Salata**,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會學論壇的地方委員會副主席 , **Emil Sobottka**, PUCRS, 巴西, 第四期ISA社會學論壇的地方委員會計畫協調員.

南裡奧格蘭德天主教大學(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是第四次社會學論壇的舉辦地。Marcelo Träsel/Flickr 攝。
保留部分權利。

巴西社會學界當前的狀況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高度的制度化、多產且多樣化。另一方面,政府官員毫不含糊的嘗試讓社會學對社會發展的貢獻與關聯去合理化。正是在這個敏感的背景下,巴西將首次主辦國際社會學協會(ISA)的一項重大活動:第四屆ISA社會學論壇,此活動將於2020年7月14日至18日在阿雷格里港的南大河天主教大學(PUCRS)舉行。巴西人對ISA的支持並不陌生,與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不斷增長一樣,而且,這正與費爾南多·恩里克·卡多索(Fernando

>>

Henrique Cardoso)主席的聲明雷同(其為ISA自1948年成立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的拉丁美洲主席)。在這種複雜的背景下,社會學家的加入使得這場論壇更富有意義。

巴西社會學界最初是藉由不同的專業領域來建構出民族認同問題而彰顯出來。種族問題因當地人口組成的多元性而受到特別的處理:歐洲白人、被奴役的非洲黑人與原住民。即使種族與現代化問題仍然是社會學家間經常討論的議題,在過去數十年來,古典作家的影響與對實證研究的日益支持有助於多樣化與民族社會學的發展。在軍事政權的統治下(1964年至1985年),年輕世代的社會學教授被迫流亡,但出乎意料的是,幾個社會學研究學程被建立起來,而科學期刊也被構思且公開發行。

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一直都是大多數巴西社會學家關注的焦點。舉例來說,巴西社會科學的奠基者之一吉爾貝托·弗雷雷(Gilberto Freyre)提出一個問題,即巴西自成立以來,社會秩序如何在巴西社會強烈的對抗中取得平衡。同樣的,弗洛斯坦·費南德茲(Florestan Fernandes)的貢獻是無法計算的,他(與他當時的學生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等一群社會學家)對不平等與分層的古老形式如何能夠在現代化進程中倖存下來進行很扎實且大量的研究。對這幾個問題有高度重視是毫無疑慮的,因為不平等現象的嚴重程度與持續性被視為巴西史上長久的主要特徵。

1984年後的民主化時期促成要求公民權和政治參與權利的社會運動激增,民主與社會正義緊密相連。這些主題常被作為研究參與者的社會學家所吸收與理解,因此,絲毫不驚訝的是,巴西的現實需要仔細的進行社會學分析,其超越對不平等的良性敘述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大多數時間的主要學識特徵。正如2013年的抗議活動主要是針對政府的經濟政策,且隨後發生的政治抗爭表明,巴西社會並不是像曾經形容的那樣,這讓社會學家們理解不斷變化的現實造成挑戰。

巴西的社會實體也需要多面向且交叉的角度來檢視,但這需要更加複雜的分析工具。例如,在巴西的勞動市場上,黑人的收入仍比白人少約40%,而經驗研究也表明,收入會隨性別、地區或階級而有所變化。若考量不同的分層原則是如何互動,巴西社會無疑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其能夠用來分析現代社會中日益嚴重的不平等現象,這種社會問題的緊迫性可能與巴西社會學界最近對環境議題的興趣有關。

在當今我們實踐的全球社會學中,作為更廣泛實體的一部份,巴西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必須在全球性的集體項目中進行研究。與上述相似的問題近來在許多國家也獲得重視,最近的政治活動,如佔領華爾街運動,表明社會現今正更加關注民主化、人民參與與不平等的問題。我們毫不懷疑巴西社會學界能夠為這場論戰做出巨大的貢獻,而我們的現實為分析這些經驗問題提供一個非常令人振奮的框架。

目前從國內不同地區的年輕研究員中選出的六篇文章是社會學界正從事豐富國家科學生產成果的範本。儘管不是詳盡的典藏,但這表明優良作品的質量,以及主題、理論與方法論取境的多樣性。這些以及許多社會科學家將參與巴西社會學學會(SBS)與PUCRS合作舉辦的ISA論壇期間的討論。■

來信寄至
Hermílio Santos <hermilio@pucrs.br>
André Salata <andre.salata@pucrs.br>
Emil Sobottka <esobottka@pucrs.br>

> 制度化童年的敘事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University of São Paulo, 巴西, ISA傳記與社會(RC38)委員會委員

收容未成年者的農業機構，巴塔泰斯，聖保羅州，巴西。
來源：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在軍隊獨裁時期(1964-1985)，巴西人民不只經歷了政治迫害、惡意拘禁、拷打折磨、審查制度、人口失蹤，還目睹了高壓統治下處於社會邊緣、流離失所的孩童遭受他人利用。針對這一點，政府創立了國家青少年福利基金會(FUNABEM)，以負責當時的所有嬰兒、孩童的安全。FUNABEM整合了當時的所有規訓組織，並強化了對窮困孩童與青少年的收容。對這些孩童、青少年而言，曾在全控機構中與外界隔絕的童年時期，會使其在成年後因先前的收容經驗而留下污名的標記。在十幾年過後，一部分當時受到拘禁的青少年、孩童，透過了社群媒體、年度聚會重聚，形成了一種人際網絡。而這都是為了不要讓自己忘記當年那一段記憶：鄉村生活、制度下的壓迫、對未來的不安感、童工、男性的社會化歷程、以及規訓。

我們採用了「記憶」的社會學理論形成研究框架，去瞭解研究對象過去收容時期由規訓機構所建構的記憶實作的過程動態，以此去處理研究對象的成長時光以及身份面向。在四年之中，我們已經收集了許多關於他們多面向互動過程的資料，透過交織在一起的意識、社會關係、技術物(artifacts)等相關的面相去調查他們形成記憶的過程。資料收集的方法從深度訪談到傳統民族誌(traditional ethnography)、網路民族誌(netnography)等。我們使用詮釋學(hermeneutic work)的方式，在時間序列上去做程序處理，詮釋他們是如何去理解過去的經驗，以此去處理他們的敘述內容。

我們發現時間序列以及他們互動中的改變，是他們如何去定義自己的身份、理解自己過去的決定因素。他們的敘述時常被理解成是掩飾真正

>>

過去的收容者再次拜訪收容機構。
來源： 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事件的一種詮釋方式。這些敘述通常隱藏了他們過去艱辛的事件,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意義被捏造出來,融入這些事件中形成一種被人生目標啟發的故事情節。而除了他們的敘述之外,三種負面的情節被他們詮釋成正面的形象:父母的棄養被形塑成一種利他行為(altruism);制度性的暴力被認為具有合法性;在監護設施中被當成童工剝削被當成是一種提拔他們成長的經驗。

存在於同一個集體記憶的群體會創造出一種「驗證網絡」(network of validations)。在這個意義上,某一些特定的詮釋方式比起其他種方式更加普遍。在社群網絡中,構成他們過去的意義與詮釋方式會多少趨於一致,因為當局外人的說詞不被網絡裡的其他人認可,這些說詞與詮釋便會日益消失在社群思想中。雖然自傳式的敘述仰賴的是個人記憶,但當我們試圖以一般的角度去理解研究對象,會促使這些先前受收容的對象將他們對過去的敘事調整為具有整體性、正面性的,一個完整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中遇到的許多艱辛困難(棄養、機構暴力、被隔離的童年記憶、被污名化的人生,這只是其中幾點)被認為是迎向成功的墊腳石。機構刻印在他們心中的那些價值觀被獨裁政權的單位所褒揚宣傳,特別是那些透過規訓成長的孩童,時常不帶批判地遵循規則。在這個驗證網絡之中,建立一套標準論述的方式使他們對於過去的經歷產生一種歸屬感,而其他有相同經驗的人也會對此感同身受。■

來信請至Veridiana Domingos Cordeiro
<veridiana@uchicago.edu>

> 社會救助作為政策部門：巴西的案例

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Federal Institute of Rio Grande do Sul, 巴西

1988年，制憲會議的成員們慶祝巴西聯邦政府憲法的頒布。
來源：Agência Brasil/Archive.

在巴西，現代化的國家政權建立以來，社會救助的制度始終不受重視，政府所挹注的資源並不穩定。針對此議題的提案也總是基於公益與慈善的理由。社會救助的相關業務更往往被視為一種社會安全保障的措施，使得主管這兩項業務的部門彼此間的界線日漸模糊。本文奠基於筆者的博士論文研究，將會分析在社會權的概念下，社會救助機制進入行政體系的制度變革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分為兩大階段：第一，巴西聯邦憲法中的入法（1986-1988），以及「社會救助組織法」的立法（1991-1993）。在這兩個階段裡，各方人馬均針對相關議題向政府提出建言，促成了新部門的成立。

在第一階段的立法進程中，組織改革的主力來自於關注國家社會安全網重組議題的社群，透過參與聯邦政府事務體系所召集的專家團體，他們得以影響政府的運作。這些倡議者將社會防護的機制視為一種國家應保障全體公民均能享有的權利，並期望能建立一個與此理念相符的體制。對他們而言，社會救助將能在他們提出的政策方案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相關制度能確保那些被遺漏在社會安全網之外的公民，也能為其他形式的社會防護機制所保障。

第二階段立法的特點則是社會工作領域的專業從業人員及學者的加入。在修訂後的聯邦憲法公布生效之前，這些專業人士並沒有參與研議的過程。但在這波修法的討論中，來自學術界及社會工作實務界的行動者卻逐漸集結起來。這被解讀為法規上的轉型對相關部門看待他們自身與國家體制關係的連帶影響。長期以來，諸如「國家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資產階級進行再生產的工具」，結構主義觀點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在當地瀰漫著。這種理解國家運作方式的理論在1980年代末期開始式微，於此同時，將國家視為反霸權鬥爭場域的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思想興起。此一轉向也使得從事公共政策及社會工作相關領域的專業工作者與研究者一改先前觀望的態度。做為這個理論架構轉型的結果，學術界跟社會工作業界人士共組一個倡議團體，進一步促使社會救助跟社會安全區分成不同的行政部門。

本研究的結果指出，只有外於既有社會政策、不隨之變動的因素，如軍事獨裁政權的終結、全新民主政體的成形及相關領域（社會工作、社會安全）團體的積極運作等幾項條件俱足的情況下，社會救助體系才得以進入巴西政府體制的當中。■

來信寄至Gustavo Conde Margarites
<gustavo.margarites@gmail.com>

> 愉港女性的都市居住抗爭

Priscila Susin,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Rio Grande do Sul, 巴西

Priscila Susin 在阿雷格里港市中心俯瞰主要由女性管理的蹲點建築屋頂,2019。
來源:Priscila Susin.

在巴西的主要城市中,住屋供給不足的情況波及了許多貧窮人口,尤其黑人女性更是受其影響。自1980年代以來,如棚戶區運動的住屋社會運動於都市地區興起,引發了新的政治劇碼;佔用市中心廢棄建築的現象中,人們注意到城市中有大量已經毫無社會功能的房產。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居住於這種空間的是女性,這顯示她們不管在制度上還是在日常生活中,都遭受了多種層面的隔離。我在博士研究中和這些女性建立暫時性的紮實對話,試圖理解他們在參與政治倡議團體以及搬進棚戶區之前與之後,對於居住抗爭行動的詮釋與經驗。

> 詮釋性與傳記取徑

田野調查是在2015至2018年、於南里約格蘭德周的首都愉港執行。為了蒐集歷時與共時的傳記資料,我針對居住於兩座市中心棚戶區建築中的多位女性進行參與式觀察與傳記式訪談。在經驗資料的蒐集上,我幾乎每週參與社會運動的行程,以確保能對政治與日常事務有持續的了解。

此研究所應用的方法在認識論上以Alfred Schütz的社會學以及一套借鑑於Berger與Luckmann的完整概念為支持基礎;前者又以「

>>

在阿雷格里港市中心的蹲點建築牆上,寫著「城市中心屬於人民」的塗鴉,2018。
來源:Priscila Susin.

相關系統(relevance system)」為主,後者則是關於如何能夠觸及現實中的世俗社會結構典型。由Gabriele Rosenthal 所提出的傳記取向研究方法,也協助重建這23位受訪女性身處於社會、歷史框架中的傳記經驗。

> 在「傳統化」與「政治化」的符號領域之間

主要的研究發現揭示了住屋和性別議題的交織性,為解決這類研究在方法上的侷限提供了一個以經驗為基礎的觀點。透過重建受訪者的相關系統,我們得以凸顯束縛、反抗與應對,這些從預想的分析範疇中通常不會被考量的因素。

藉由處理日常生活中的階層文化,可以發現社會運動組織的本質抹煞了女性在經歷「抗爭」時平等地參與政治的機會。然而如同進行田野時所觀察到的,新政治活動的不斷發展與近年來性別相關的傳統監督原則的衝突與變化有著根本上的關聯。

在傳記分析中,「傳統化」與「政治化」之間潛在解釋的重疊於符號領域中一再地出現。為了賦予遊走於城市違法邊緣正當性,受訪者表示其在面對社會所期待的性別角色如負責生育與家務勞動,以及實踐新興的政治理念如取得適當的住宅與進入都市的權利時經常會面臨的矛盾。即便前者很大程度地與外部的、被寫進法條中的階級價值觀相關,後者則是與抗爭的內部政治相關、並可能導致居住抗爭被概括為一種「手段」和「目的」;這兩種類型的自我展演都是為了累積更多的道德資本。■

來信寄至Priscila Susin
<pri.qsusin@gmail.com>

> 巴西勒西菲市 針對暴力行為的非正式治理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Federal University of Pernambuco, 勒西菲, 巴西, 拉丁美洲社會學協會成員 (ALAS)

勒西菲,巴西,2019。來源: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

在中南美洲不具行政自治權的地區，正式及非正式的暴力管制措施，以及在地治理等議題，早已是社會學研究多年來的研究題目。筆者希望能夠透過本研究（同時也是筆者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理解在沒有州政府層級政府機關介入的情況下，巴西勒西菲市（Recife）南部社區的暴力行為是如何被控管的。就實務層面來說，州政府層級外的暴力管制規範意味著當地的行動者之間存在協議以及對彼此的授權，使得在體制之外仍舊能夠在互信的基礎上有所應對。

而本研究即提出一項假說，認為巴西當局警察機關的執法效能與缺乏刑罰的正當性與法源依據，造就了當地在暴力治理的議題上出現州政府體制外非正式治理的現象。其他與社區暴力的管控動輒有所關聯的重要變因，也包含了毒品市場的動態以及由在地行動者建構的非正式治理網絡，前者的破碎化在阻絕了監管者權力的集中化，後者的存在也對當地的謀殺率造成影響。本研究以民族誌的方式蒐集調查資料，即筆者在勒西菲市一個低收入社區中生活五個月，除採行非參與觀察研究外，也在過程中進行數十次的正式與非正式的半結構式訪談。

目前的研究的進程指出，憲兵在該社區中的運作與部署將是後續針對非正式治理的探究工作中極具解釋力的一環。在社區裡，憲兵幾乎可以在無須承擔責任的情況下，無預警地且不成比例地以濫權對居民施行一連串的限制。至於當地的司法機關，在衝突調解的議題中，則在法律上缺乏正當性，無法發揮作用。

在所有發現中，與本研究最為相關的可能是，社區裡針對暴力行為的規範是在當地受景仰者的指使與授權而得以運行。誠如過去對於黑手黨（Gambetta，1993）或是PCC（Primeiro Comando da Capital，巴西最大的犯罪集團）（Feltran，2010）的研究，在這樣的非正規處置機制裡並不存在穩定的處分與執法者。也如同Bourgois及Venkatesh分別在2003年及2009年的研究發現，在地的幫派組織尚未涉入此一議題。

儘管這些作為對減少犯罪情事往往治標不治本，但它們確實擁有影響力，也顯現在當地暴力行為可以被掌控在相較警察執法更具正當性的作為下。而當地的非正式治理形式或多或少投射出一種意圖：當矛盾形成時，當地人期待的是化解衝突的機制，而非一個減少紛爭發生的制度框架。衝突調解的主事者在執行時常審慎為之、暗中行事，這使得大多數的居民並不清楚這些處分的運作機制。因此，這些處分也就不會成為此類作為的典範，進而跟當地既有的暴力防治需求產生連結。■

參考資料：

Bourgois, P. (2003) *In search of respect: Selling crack in El Barrio*.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eltran, G. (2010) “Crime e castigo na cidade: os repertórios da justiça e a questão dohomicídio nas periferias de São Paulo.” *Caderno CRH* 23(58).

Gambetta, D. (1993) *The Sicilian Mafia. The Business of Private Prote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enkatesh, S. (2009) *Gang leader for a day*. London: Penguin UK.

來信請至 Ricardo Caldas Cavalcanti
<ricardocaldas13@gmail.com>

> 巴西的職業不平等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Federal University of Minas Gerais (UFMG), 巴西

在巴西，追求專業階層及高學歷不再能在勞動市場中取得優勢。

由於高等教育的擴張及民主化，巴西的職業環境遭逢改變。在2000年到2010年之間，擁有大學學歷證明的人口數增長了超過一倍，其中包含在過去教育參與程度偏低的族群、女性，以及傾向將自身定義為棕色／黑色人種和低收入的人。

相較於高收入國家在1960年代便出現大學入學人數的增長、有著超過50%的淨入學率，相同的現象在巴西直到1980年代才出現。在2000年至2010年之間，18到24歲之間的青年具有大學入學資格的比例從28.4%提升至48.5%。縱然如此，實際上真的進入高等教育範圍的比率僅從9.1%增至18.7%；淨入學率則從7.4%增至14%

>>

，其相較於智利或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國家2010年超過30%的淨入學率，在數值上而言仍是較低的。

除此之外， 剛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才，在進入勞動市場時並無法符合相應的需求。學歷證明如今陷入了通貨膨脹的處境，例如工作中更高的教育程度門檻、專業人士進入勞動市場後無法被有效利用、專業職務的競爭加劇，以及學歷證明的經濟價值萎縮。學歷的通膨不只涉及到供需的不平衡，也與在社會上透過學歷證明取得優勢的能力下降有關，學歷證明也被貶值為一種社會分配機制。

我的博士學位研究主要的目標，是理解專業團體之社會基礎的擴展、以及學歷證明的貶值，如何影響了立基於專業主義之上的社會分層，特別是與中產階級相關職位的保存與取得。我的研究會聚焦於衛生領域中兩個專業——藥品與護理——的軌跡，對1991至2010年間、專業內和專業之間的不平等進行實證分析。

本研究參考了公家機關公布的人口統計、高等教育相關統計，以及勞動市場資料，並收集了來自線上調查的樣本，共計217位醫師及222位護理師。同時藉由關聯和群集分析來建立軌跡，試圖從經驗性的角度，組織職場在不同個體經驗中的變數，從家境出身、專業訓練到工作取得。此分析使得從研究對象的職位、部門和工作更動來解釋職場得以可能。

研究中有四項較重大的發現：(1)學位證書與畢業生數量由於高等教育名額中的空缺增加，在1991至2010年間有顯著的增長。(2)工作招募的社會基礎擴展至女性、低收入學生、自身認同為黑色或棕色人種的人等對象。(3)在職業市場中的競爭更加激烈的情況下，中產階級的學歷貶值。(4)在學大學生的人口數增加，女性、黑色與棕色人種、青年和聲望較低的專業人士處於不利的地位。

從軌跡可以發現，家族的繼承和高等教育的途徑在取得職場中的重要職位時有顯著的重要性。畢業的時期與專業人士的年紀也會影響專業間與專業內的分工。性別隔離也是其中一個因素，女性在較低資本的軌跡中參與程度也較高。專業內和專業外的分工都會再製並強化職場中的不平等。這樣的分工也體現在受訪者的階級觀念上。

簡而言之，在1991至2010年間的巴西，專業主義的開放重新定義了職場，使其變得資本較低，且較不平等。即便社會提升的運動逐漸擴展，從專業間、專業內分工的角度而言，職場的內部結構仍未改變，專業主義作為一種職位再生產的機制得以持續存在。■

來信請至 Lucas Pereira Wan Der Maas
<lucaswander@hotmail.com>

里約熱內盧
中產階級的發展歷程

Izabelle Vieira, PPCIS/UERJ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巴西

Arbu繪。

在2000年代時巴西經歷了經濟成長,使人們感受到了收入與消費水準的提高。然而,在2014年國內爆發的政經危機中,只讓人們感受到失業率的上升以及貨幣的貶值。

為了瞭解社會流動的過程,以及近期爆發的政經危機對中產階級生命歷程的影響,我們採用質性研究並使用參與觀察法與深入訪談法,對里約熱內盧的佩欣莎(Pechincha)地區大廈中的28位受訪者進行研究。

研究中的參與者皆自認為屬於社會階層的中間區塊,與「中產階級」或其他相關詞彙相呼應。

參與者能夠敘述出他們生命歷程中的高潮迭起,如同受訪者Igor(42歲,司機)所言:「你看看,我曾經上過中學。.....我不會說那有多厲害,但已經算很不錯了,如今我卻處於人生的低谷。」一般大眾的想法都認為景氣繁榮的時期都是一段空想,因為過去並沒有穩定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基礎。

在近期團體研究中指出,消費的規模是驅動社會分化的關鍵。如今人們面對經濟危機必須減少消費模式,也因此商品時常立足於令人無法滿足的象徵邊界上:「消費性商品給了人一種已經成熟的不恰當印象」(Arthur,46,空軍);「我覺得中產階級受廣告影響很深。廣告鼓勵人們旅行,但一旦你去旅行,你又會發現實際上的旅遊體驗不像廣告說的那樣(笑)。」(Gilmar,64,銷售員)。

從受訪者的敘述中可得知,在他們的家庭中他們受到父母很大的期望,這些父母都希望他們的小孩能夠比他們得到更多的教育。這些父母為了他們的小孩做了真正的「犧牲」,只為了讓孩子去讀私立的小學跟中學。而價值觀的傳遞與實踐是他們拒絕公立學校最主要的原因:「.....讓孩子與其他同齡孩童一起共處於這種非凡的教育是重要的,對吧?這是我們對孩子付出最大的關心。」(Ilza,47,待業中,前保全)。

此外,受訪者們對於如何維持他們的社會地位感到非常地不安。在這個意義上,私立學校同時擁有象徵與階級歸屬的工具兩種屬性:「情況很可能是我的孩子需要去讀公立學校,而我卻已將自己看作與他不同的階級。這樣真的很奇怪!」(Lara,42,待業中,前保全)。

中產階級並沒有累積財富,他們只擁有知識與工作技能。這些「資本」將在每一個世代中更新,在新的世代中,可能就需要付出某些努力與承諾才能重新獲得。因此,無法在當前的政經危機中抓住一線生機的中產階級,只好將社會地位提升的希望賭注在他們的孩子身上。■

來信請至 Izabelle Vieira
<representar.mg@hotmail.com>

> 經濟緊縮：醫療照護的普世性原則會被妥協嗎？

Maria Petmesidou, Democritus University of Thrace, 希臘, **Ana Guillén**, University of Oviedo, 西班牙, **Emmanuele Pavolini**, University of Macerata, 義大利

當提供共同醫療服務的範疇或是獲得醫療服務的條件有任何變化，普遍性原則的輪廓與社會基本的團結將會大幅改變。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自從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早期就擁有全民醫療照護系統，但是，後面兩個國家卻因其自身「不完全」的普遍性原則而受人注目，因為不平等的混合型照顧服務一直持續到最近，其將社會衛生系統中負擔不同社會階級的社會衛生保險與高額的自付費用結合在一起。金融危機對所有四個醫療照護體系造成沉重的打擊，其中對希臘的影響最為深遠。

金融危機與財政緊縮政策是否使這四個醫療照護體系正朝向普遍性原則的範圍與內容而有明顯轉變？簡言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確的證據指向這個結果。在過去十年中，這四個國家都有實行一系列類似的政策，如提高成本的分擔（主要是藥品）、條款的改變或是物質與人力資源的減少。然而，這四國的這些措施將大幅度的轉移醫療費用給病患，並加劇獲得醫療服務的不平等。此外，面臨最嚴重的主權債務危機（並已接受救助計劃）的希臘和葡萄牙，在國內外壓力錯縱複雜，且僅有較精簡的公眾服務的情況下，仍大大的催化出旨在解決系統碎裂化、提高透明度、促進供給均等的改變。

> 公共支出的下降與未符合的需求

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2008—2013），希臘的人均公共衛生支出（為能夠進行比較，運用購買力平價進行衡量，並以2010年固定的價格計算）急遽下降約30%。而葡萄牙、義大利、西班牙分別下降12%、8%、3%。隨後，希臘與義大利的調降幾乎停滯，但在西班牙與葡萄牙有適度的恢復的趨勢。但是，在這四個國家中，與歐盟15國（指歐盟東擴前的15個會員國）平均值的差距持續擴大。2017年，希臘的人均公共衛生支出跌到只剩歐盟15國平均的三分之一，而葡萄牙則跌到剩歐盟的一半。西班牙跟義大利則較接近歐盟的平均值。然而，特別是自從2013年，這四個國家就醫的私人費用一直在增加，其占就醫總支出的24%（希臘）至40%（西班牙）。

時至今日，希臘因為無法負擔醫療支出，而顯現出高比例不符需求的醫療照護。在希臘，即使是中產階級家庭，特別是有小孩跟老人的家庭，也有負擔醫療照護支出的經濟障礙。因此，醫療費用私人支出的潛在風險對家庭預算維持災難性的高。在西班牙與義大利，在危急時期接受專科治療與醫療照護的等待時間構成影響人們對不同醫療水平滿意度的主要障礙。然而，未滿足需求的比率在西班牙保持最低。但是，這兩個國家在醫療資源的分配上有很強烈的地區差異。這在義大利特別明顯，南部地區與中北部地區相比，嚴重缺乏足夠的資源。

希臘（某種程度上葡萄牙也是如此）進行醫療改革，使其能夠更嚴格監控醫生的醫療行為（例如對診斷/實驗室檢查後轉診人數進行限制、處方藥每月限額等），藉此讓醫療體系更加透明化，有助於控制成本。但與此同時，改革會影響醫療體系的滲透性與導航性。在這兩個國家，初級

>>

「在希臘，連即使是中等收入家庭，特別是那些有孩子和老人的家庭，也面臨著醫療保健方面的財政障礙。」

與專科醫院的照護間依然混合著零散的照護途徑。此外，在這四個國家中，幾種能夠避免住院的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哮喘等）較為常見，反映出在初期預防的衛生健康提倡效率較低，對公平產生負面影響。

> 值得關注的重點

以下有幾個重點。第一，遵守衛生政策來緊縮公共部門資源的作法持續存在。這顯現出人均私人醫療保健支出正穩定成長，而公共支出的增長相當緩慢（或停滯）。第二，原則上承保資格維持全面性，但實際上對許多弱勢群體來說是一大挑戰（因每個國家不同的原因，如負擔不起費用、漫長的等待時間與遙遠的就醫距離等）。第三，私人醫療保險（職業或自願）正在擴大：2005年至2015年，西班牙的私人保險費用幾乎漲一倍，葡萄牙則明顯的上升。義大利的危機也正在增加，而希臘的危機則停止初期上升的趨勢。但希臘自費的金額一直穩定增長。到目前為止，人們投保私人健康保險是為了能夠更快速的獲得專科護理，其中主要涵蓋大型企業的員工。

未來這種趨勢將如何發展以及損害全民負擔的可能性大大的取決於幾個因素，例如重新制定公私混合的政策、勞工的偏好、稅務政策等。如果職業健康保險變成更全面性（覆蓋多數工人並受到嚴格監管，正如幾個北歐國家的情況），那就能夠在接觸醫療過程時保持平等。這將能夠減輕公共財政的壓力，但同時又能夠維持普遍性的醫療支出。但是，如果職業保險僅覆蓋部分勞動人口（特權階級），即有可能變成特殊職業互惠主義的保險類型，最終將會削弱普遍性原則。

最後，在可預見的未來，公共醫療體系將會面臨巨大的財務壓力，伴隨著衛生領域科技快速發展，以及對早期預防服務（由於這四個國家的表現不佳）與因人口高齡化造成社會照顧服務（主要是長期）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可能進一步觸發重新組成公共與私人間的連結，並改變醫療保健領域的社會團結。■

來信請至: Maria Petmesidou
<marpetm@otenet.gr>
Ana Guillén
<aguillen@uniovi.es>
Emmanuele Pavolini
<emmanuele.pavolini@unimc.it>

> 新零工紀元的失業救濟金

Daniel Clegg,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英國

零時契約是英國的勞工抗議時常出現的議題。
Christopher Thomond 攝。

為身體健康且能夠工作的成年人提供替代收入一直以來都是社會政策中最有爭議的問題。為保護非自願離職而導致收入的損失，失業救濟長期以來被批評可能會成為對自願離職的一種補貼。在近幾十年，這種論述在媒體與政治辯論中格外地獲得人們的關注。過去二十五年來，所謂福利條件緊縮政策（增加對求職者的要求來證明其努力重回工作的決心，並對不遵守規定者減少或終止福利）可能是歐洲國家失業福利改革中最突出的特色。這種措施試圖回應大眾對濫用失業救濟金的關注，然而，卻自相矛盾地強化失業救濟金是廣泛濫用的這種普遍觀點。

> 就業碎裂化與工作的不確定性

然而，長期關注失業救濟金濫用與有關求職者責任的相關論述蓋過失業救濟金政策在二十一世紀初面臨的主要挑戰。失業救濟是在勞動市場中構想出來的，其認為工作大量被重新包裝成提供男性工人從事更長時間的工時與連續不斷的工作。而製造業的增長導致勞動力的“去零工化”，並作為公共政策與集體談判的目標而積極

>>

追求。相較之下，在今日，服務業為主的富裕民主國家正聚焦在各種非正式雇傭關係類型的激增，尤其是短期或不連續性工作的重新出現，有時候被視為是自我就業。新科技更進一步促進工作分工的碎裂化，加速「零工經濟」的到來。各國政府不願去抵抗這種趨勢，並經常積極的促進零工經濟來作為增加競爭力與就業率的途徑。疲弱的工會組織證實無力抵抗這個潮流，我們正進入零工的新紀元。

今日，對很多人而言，特別是低技術勞工，失業跟補償形式的失業救濟金相比是一種非常不同種類的社會風險，失業不再是長期穩定工作間的偶爾休假，反而逐漸變成或多或少短期、不定期或不安全工作期循環的特徵；因此，失業與就業間的界線明顯變得模糊。在一個月的第一周與最後一周受聘工作，但其中剩下的時間沒有工作的工人，在那個月該被視為是受聘還是失業？當一個工人擁有兩個兼職工作，並在失去其中一份工作時，是該以他們仍然擁有工作還是失去另一份工作來定義呢？

> 工作的福利：使工作獲得報酬？

在新型勞動市場的背景下，真正體現出失業救濟政策面臨複雜挑戰的趨勢，不是普遍轉向更為嚴苛的條件，而是在職社會保障福利更適當卻更不均衡的發展。近年來，許多歐洲國家引進並擴張工作福利，無論是作為新興獨立的權益，或是透過修正失業保險或救助金的資格標準，在職福利讓人們相信失去工作可能是自己缺乏努力、工作動機或責任感。然而，在職福利的存在僅是因為在當代歐洲勞動市場中，許多求職者的再就業機會獲得的報酬與安全性低於失業福利，儘管後者的價值不高。

然而，透過社會福利體系來補充收入是一種自身充滿困難的政策。如果要替失業者提供有意義的激勵措施，使其重新就業，那在職福利就需要提供工人工作收入外的補充收入，並確保就算新工作馬上丟掉，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己比當初失業處在更糟的處境中。這為工作與非工作時期之間開啟一道大門，使其能夠透過永久性的隱性補貼制度無限交替、短期工作或間歇性僱傭關係制度化。然而，普遍基本收入的建議正有這種缺陷。因為在職福利聚焦在低收入者來限制其成本，勞工時常在追求更高工時與收入時產生更高的有效稅率，從而加強工人陷入低薪的處境中。

> 彈性安全或產生穩定性

面對這種實際的政策挑戰，數個歐洲國家最近（與2019年法國的失業保險改革一樣）宣布在職福利的重大限制，因而再將他們的主要信念從失業者轉移至穩定就業的條件下。在維持在職福利的情況下，還引入“在職條件”，試圖對在職福利索賠採取更嚴苛的行為控制，來促進就業發展，這與英國新的普遍信貸制度一樣。在這兩種情況下，似乎都將當代低端勞動市場現實的責任置放在最直接限制他們經濟發展的人肩上。

問題真正的癥結點在於，很難將現代歐洲福利國家核心的現金轉移系統（伴隨補償風險）應用在勞動市場環境中，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期的是，工作將會變得毫無保障。「靈活性」是近期將勞動市場彈性與社會保障連結的流行政策理念，這是一種簡潔的規範，但對收入維持體系如何能夠保護臨時雇員不產生螺旋式的成本、意外的後果或這兩個情況同時發生，並沒有提供實質的引導。只有當歐洲勞動市場能夠再次生產基礎且穩定的水平，失業保護政策才有意義。這將需要對就業進行更好的監控，而不是對弱勢的工人進行更嚴苛的行為管控。■

來信請至Daniel Clegg
<Daniel.Clegg@ed.ac.uk>

> 走向對立的社會：當社会政策开始注重主体性

Roland Atzmüller,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奧地利

福利制度的發展在歐洲由薪資領導成長模型（福特主義）的積極福利活動，轉為國家緊縮政策而興起的供應導向的社會政策。從1980至1990年代，這種計畫已經在各國國內新自由主義改革而實施，並且在2008年後更蓬勃發展。這些改革要求個人與其家庭增加自身社會保護的責任，避免市場主義的風險。在許多國家，社會保護政策（養老金、健保）私有化是這種發展的典範，卻加劇社會不安全感與不平等。

然而，個人的自我責任感與主觀（工作態度、技能與能力）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與社會危機的活動緊密相關。個人化與主觀化的社會政策主要透過所有健全成年人的流動，來穩固、增加並活化勞動力與資本間的交流。這包括擴大育兒照護與在正規經濟中（永久）提高個人的就業能力等活動，並與財政緊縮政策相對應，轉為人力資本為導向的社會政策，其代價是更廣泛的社會保護與照護的需求，這意味著要確保社會凝聚力與弱勢社會群體融合。這也導致許多國家貧窮階級的增加與社會排斥的現象加劇，因為如老年人、身心障礙者、長期病患者等群體被視為非生產性成本因素。

這種變化使得福利服務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其主要任務是透過社會工作與社會教育，並透過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職業教育與培訓（VET）等有爭議且矛盾的組合來處理人們就業的問題。福利服務活動越來越多地外包給志願性組織，甚至是轉移給私人部門，並透過新型的供資制度（與產出／績效有關的工資、短期合約等）來嚴格控制，這種發展不僅使福利服務的接受者受到難以抗拒的挑戰，這項挑戰正是根據市場需求而發展出自我管理的能力。這對員工的福利服務帶來新的壓力與要求，因為這必須權衡緊縮相關的資金短缺、對工作質量專業化的要求與客戶的期望與反饋。

此議題成為批判性研究新的挑戰，因為福利制度與社會政策的個人化與主體化已經超越對福利制度去／商業化的關注。這種分析側重在福利制度以不同方式保護部分勞工階級免受資本主義下勞動市場的負面社會影響，並穩定男性為主養家的基本傳統家庭形式，或使婦女能夠靠自己獲得社會權力並參與有薪工作，此分析也清楚認知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政策的模稜兩可，並顯示出凱因斯主義福利國家如何支撐1945年至2008年全球北方經濟成長與其消費模型的出現。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的福利改革能夠描述成透過勞動市場與福利制度的彈性化與自由化來使勞動力重新商品化，並實現社會保護市場的策略。

儘管轉向緊縮政策與供應導向的社會政策表明後者已經受到經濟動能的影響，但新自由主義超過三十年緊縮福利制度與削減社會支出的嘗試並沒有真正成功的降低大多數國家的總體支出水平。但是，這並沒有告訴我們有關個人獲得社會服務的權力是否足夠，與此相反，社會政策體制正在深遠的重組，其旨在改變個人及其家庭對有薪勞動、扶養子女、職業教育、生產與健康的生活方式、文化規範等的權利義務與其態度。至少從歐洲的角度來，社會政策活動的個體化與主體化（儘管在國家範圍內有所不同）帶來福利制度的極端分化，這是從國際經濟失衡、金融資產累積危機與緊縮政策應對隨後主權債務危機造成的後果。

福利制度在兩極分化中擺盪，一方面是對在勞動市場地位較低的勞工，運用工作福利的激勵政策，另一方面則是社會投資策略。工作福利制

>>

「由於緊縮正因緊縮政策的關係，社會政策朝人力資源導向的社會政策的轉移，造成社會保護與照護的需求增加。」

度的重點是將有工作能力的失業者與貧困者，以及其他沒有正當理由（如母親身份）卻沒有參與經濟活動者，不惜一切代價地納入勞動市場中。另一方面，社會投資策略越來越重要，其目的是透過生產力支出與其活動來重新合理化公共政策的作用，從而改善經濟的活力與競爭力。社會投資活動的重點永久適應與重組個人的技能與能力，即人力資本，以及擴大幼兒照顧設施。然而，後者的目的不是要改變家庭中的性別分工，而是要動員婦女參與勞動市場。

因此，這些政策並沒有改善經濟結構，解決資本累積與市場化帶來危機與破壞性的影響，而是聚焦在使人們適應全球化競爭的需求以及日益靈活且不穩定的市場。這些發展形成一種主觀的危機管理形式，其要求個人適應與提高他們技能的意願與能力，以及對靈活或全球化市場所需的其他主觀特徵。因此，解決金融化經濟危機與結構性變化破壞性影響的必要性已經轉移至個人身上並縮小他們發展自身能力的可能性。此外，作為一種後波蘭時代的社會政策，這些發展將經濟融入社會並解決其對社會的影響的任務轉移至個人。這正在破壞社會的凝聚力與融合，因此，不僅對國家社會、對於歐洲聯盟作為一個整題也構成了威脅。■

來信請至 Roland Atzmüller
<roland.atzmueller@jku.at>

> 南歐對家庭政策的支持

Sigita Doblytė, ISA貧窮、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研究委員會 (RC19) , **Aroa Tejero**, University of Oviedo, 西班牙

公眾支持家庭政策的文化價值在南歐各個福利國家造成不同的影響。

時至今日，個人與福利國家都會面臨需要更加平衡工作與生活的軌跡的挑戰。儘管福利國家試圖鼓勵婦女參與勞動作為一種防止貧困的策略，但家庭在兼顧照護責任與就業中遇到困難。育兒服務的提供能夠外部化（儘管會對父母造成經濟負擔），或是能夠透過政府資助或政府提供育兒服務，這能夠視為是更為公平並符合社會投資的邏輯。

> 文化價值與照護的提供

然而，歐洲的福利國家在工作與家庭協調政策在範圍上有所不同，特別是南歐國家，其特點通常是保守文化價值觀占主導地位，且家庭在提供照顧方面佔有核心地位。這幾個國家在家庭福利方面的支出大大的少於北歐或其他歐陸國家，而且與其他社會保護政策相比，家庭政策似乎沒有獲得更多的重視，以福利總支出的百分比來衡量，南歐國家家庭福利的公共支出均低於歐盟的平均，希臘、葡萄牙、西班牙的比例在2016年位列歐洲最低的五國之中。不過，同年的歐洲社會調查顯示地中海國家（義大利、葡萄牙與西班牙）是最支持擴大工作與家庭間協調政策的國家，即使這代表要對所有人課徵更高的稅收，因為額外的公共服務代表著額外的支出。

各種實證研究發現，公眾對社會政策的態度通常會受社會群體需求與自身利益影響。舉例來

>>

說，有小孩的家庭或潛在父母身分的年齡層可能會對更好的家庭服務表示更多的支持。但是，有些研究也強調文化價值對驅動福利國家與其政策的態度的重要性。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教授Birgit Pfau-Effinger博士在他的文章“福利國家政策與照護組成的發展”(2005年)中指出，有關照護的文化觀念與國家、家庭與市場的責任被嵌入公共論述中，形成國家的照護組成與政策。

> 南歐國家間的分歧

因此，我們的研究針對需求與文化價值的影響提出這些問題，試圖塑造更好的家庭服務水平來提升南歐國家民眾支付更高稅收的意願，因為在傳統上，這些國家的照護多來自家庭，但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人口增加，導致照護服務需要其他行動者的參與。根據歐洲社會調查的數據，我們強調南歐仍未有足夠的照護需求，其證據為家庭依舊提供更高水平的支持照護服務。然而，研究結果表明，不同國家對自我利益與與文化價值觀如何影響其態度的方式不盡相同。儘管通常認為南歐國家在傳統性別與家庭價值觀方面的作用相似，但我們的研究結果有助於證明它們間存在重要的差異，我們認為在某些國家中，為家庭提供更多服務的領域比其他國家更大。

在葡萄牙，總體而言，婦女或母親的勞動市場參與率非常高，導致不同社會階級與教育背景的男女在福利支持的水平一致。其伴隨的是缺乏不同文化價值觀的互相影響，而老年世代間的團結度甚至更高。這似乎表明了國家應該採取更為寬鬆的國家家庭政策。

但是，在義大利，各社會群體認為提供家庭獲得更好服務的支持度差異甚大。經濟上較無特權或是社會階級較低的人對家庭政策的支持度明顯較低，這可能是義大利相對較高的稅收負擔造成的。儘管文化價值的方向並不完全符合預期，但也發現明顯的影響：將傳統與遵從放在首位的人以及其他擁護社會正義、平等或福利政策等價值觀的人對擴大工作與家庭協調政策的支持較低。

有關福利國家邏輯的先驗價值(a priori)的未預期效應可能與義大利較高的稅收負擔有關，其進一步的擴展可能會被視為是對家庭收入的威脅，因此與上述的價值可能相牴觸，換句話說，在義大利，家庭仍被視為是最合適的照護機構，而擁護社會正義或平權比較會支持家庭收入保護政策，而非公共育兒服務。的確，2017年歐洲價值觀研究表明義大利對傳統家庭價值觀佔主導地位這種觀點有52%同意或堅決同意，其認為若母親工作，孩子將會受苦，而西班牙支持這種觀點為26%。

正如後者暗示的那樣，西班牙似乎比起義大利更加明顯地擺脫傳統性別與家庭文化：擁護社會正義、平等與福利的價值觀的個人更願意為提供更好的家庭服務而支付更高的稅收，但遵從傳統不會顯著影響對福利的支持。此外，對於育有子女的父母的支持較高，以及三歲以下幼兒在正規托育服務中的比例較低，都顯示其在正式的育兒服務中未滿足有撫養子女的家庭的照護需求；而經濟困難或居住在大城市中的人團結程度較低。

總體而言，儘管葡萄牙的調查結果表明家庭可能變得相對強大，且他們對更好服務的需求可能會成功，但在西班牙，特別是義大利，情況不一定如此。其他社會機構，如雇主，可能會在提供育兒服務或彈性工作的安排方面開始發會更大的作用，但儘管在南歐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卻仍是非常有限。然而，獲得這些利益的不平等正威脅著社會投資的原則。■

來信請至：
Sigita Doblytė <doblytesigita@uniovi.es>
Aroa Tejero <tejeroaroa@uniovi.es>

> 德國的志願服務：做善事還是影子經濟？

Silke van Dyk, Tine Haubner, Friedrich-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德國

必要的社會服務過度地委派給志工。
來源：Matthias Zomer/pexels.com.

因為福利制度瓦解、人口變化造成的新需求，以及性別與家庭關係的變化，導致我們正遭受照護與社會再生產的危機。在婦女較少能夠全職作為社會資源的時代，無薪工作的潛在照護（尤其超出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且獲得國家越來越多的支持。公民越來越常被要求要致力於共同利益，公民參與與志願工作被視為是新的（再生）資源，且志願者被譽為是日常生活的英雄。

因為福利制度瓦解、人口變化造成的新需求，以及性別與家庭關係的變化，導致我們正遭受照護與社會再生產的危機。在婦女較少能夠全職作為社會資源的時代，無薪工作的潛在照護（尤其超出家庭）變得越來越重要，且獲得國家越來越多的支持。公民越來越常被要求要致力於共同利益，公民參與與志願工作被視為是新的（再生）資源，且志願者被譽為是日常生活的英雄。在本文中，替代（substitution）一詞有時候代表將先前屬於常規工作的活動轉移到志願工作的背景下。在我們的研究中有這樣的案例，在學校的全日照護服務中，自願的“青年陪伴”彌補老師的短缺或是志願性的家庭協助者取代了國家給予家庭的支持。我們還發現一些剛浮現的需求，這些需求不是透過擴大常規就業機會，而是透過創立新穎的領域或參與模式（如老年照護）來滿

>>

足。除了直接替代常規工作的模式或預防常規就業的擴張，我們的研究更顯示替代的效用，正如受侵蝕的家庭照護或缺乏熟練勞工（如護理、行業或法律諮詢）也因為志工而獲得補償。

儘管志願服務與公民參與通常受到全國大眾的高度讚揚，但透過這樣的發展，我們發現專業化程度正在降低，沒有充分訓練過的門外漢實際上從事教育、家庭幫助、老年照護、給難民的德文課程或法律諮詢等專業工作。非專業的服務主要是針對那些欠缺資源的人，藉此來彌補國家補助缺口，或是私下購買專業服務的新興需求。因此，在福利國家中，使用志願服務不會影響公民的平等權益，相反的，人們能夠察覺到“為窮人提供的貧困服務”這種無法負擔專業援助的出現。

但是，不僅是提供服務的品質會出現問題，而且志工的處境也在某幾個領域變成準雇員，卻沒有相關的社會權利。特別是在期望志願服務者要可靠、穩定且經驗豐富的領域中，如老人照護、全日學校照護工作或是與身心障礙者一同工作，所謂「志願性契約」或是超出費用費用核銷範圍的經費補助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些津貼通常遠低於最低薪資，與此同時，勞工與集體談判的標準也正受破壞。由此來看，至少在某些符合普遍利益的社會服務領域中，此種受到高渡讚賞的參與也促成了工作的非正規化與不穩定化。

特別是在東德，公民參與跟志願工作與勞動市場緊密相關，這意味著失業者從事公民參與與志工服務，希望能夠藉此重返勞動市場。在跟志工與專家的訪談中，我們還發現有將志願參與作為有償工作的象徵性替代的論述。我們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實證結果是就業中心（job centers）的工作，有時候會排遣長期失業者參加公民參與的活動。此外，新（東德）和舊（西德）聯邦州之間還有另一個有趣的區別：在西德，人們對志願參與貨幣化頗為批評，因為（根據廣泛的觀點）這將破壞志願服務的特性與原創性；東德的情況則不同：根據日常工作獲得合理薪資酬勞的概念，志願參與的貨幣補償被認為是沒問題且合法的。在此，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強大勞動性質的後果顯而易見，其中有國家指導的志願工作與非正式的社區互助與團結，但都沒有典型公民參與的概念與實踐。

我們研究側重志願工作與參與的不同領域：難民與鄰里互助、老人照護、學校參與、志願消防隊、多待家庭的參與與地方交通服務，這只是幾個最重要的領域。在所有領域都有問題，但也完全沒有問題。在有問題的發展上，我們正在觀察社會再生產的新紀元，我們將其稱為“社區資本主義”，在這個時代，家庭外的社會社區越來越常被用為克服再生產危機的新資源。但是，我們對國家使用志願工作的批評觀點並不意味著國家就應該毫無例外的承擔所有（社會）任務，關於將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轉移到志願工作的領域，我們的批評是針對生活中依靠志願服務支持的基礎機會的領域，而不是保障社會的權利。■

來信請至:
Silke van Dyk <silke.vandyk@uni-jena.de>
Tine Haubner <tine.haubner@uni-jena.de>

> 歐盟會維持其社會支柱嗎？

Beatrice Car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義大利

2017年11月簽署的《歐洲社會權利支柱》代表著歐盟委員會的社會倡議。
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2017年11月17日，歐洲議會、歐盟委員會與歐盟高峰會的主席共同簽署一項政治宣言，其中記載歐盟所擁護並促進的社會原則，其標題為《歐洲社會權利支柱》（簡稱支柱計畫或EPSR）。這代表著尚-克勞德·榮克（Jean-Claude Juncker）領導歐盟委員會的旗艦社會倡議，他將「歐洲社會」的概念帶回歐洲一體化的未來來辯論。自從榮克主席2014年上台後，他將歐洲社會層面的議題置於與過去不同的論述中：儘管還是要負責福利與社會政策的生產，新委員會公開承認有必要就其對社會的影響重新考慮未來的政策，其不僅涉及經濟和勞動市場，還涉及社會平等、公平與包容。

> 漫長且爭議不斷的政策制定過程

正是在這種革新的論述與打破先前政策模式的意願下（在緊縮的影響完全暴露出來時），支柱計畫在2015年9月的榮克國情咨文演講中被提出。為期兩年的擬定階段後正式公布，2016年3月，委員會發布該文件的初步綱要並開啟一個特別漫長且廣泛的公共諮詢階段，該階段一直維持至該年年底。諮詢的結果明顯地促使不同利益關係人能夠更大程度的由下自上參與文案的撰寫，公眾能夠利用的意見書與委員會組織的聽證會與辯論會報告使我們能夠在最終檔案的調查中反映出各種偏好，這正是理解該計劃未來可能發展的關鍵。

>>

公眾諮詢結果的分析顯示的是，制定過程中各參與者提出的要求存在極大的差異。很多時候，我們能夠發現兩個主要參與者間存在鴻溝：一分面，民間社會組織、工業聯合會與歐洲議會強調在發生經濟衝擊時，要確保有一個「社會保護底線」來保障公民與工人的權利，並呼籲在勞動市場的靈活性與安全性間取得更好的平衡，同時呼籲採取各種政策手段來實施支柱計畫，包含歐盟新法與超國家基金。另一方面，雇主、商業協會與幾個會員國關注社會包容與保護本身的強調（與勞動市場功能沒有直接關連），並強烈反對在社會領域中採用新法或籌資機制。這組政策參與者透過「軟性」政策協調機制與輔助性原則來促進進一步的融合。

> 象徵性價值的平衡行為

檢視檔案的最終版本，我們能夠看到委員會設法平衡以下各方的觀點：在論證的層面上，歐盟機構對社會層面的論述有所改變，不僅放棄緊縮政策立場，也放棄「社會投資」的概念（如2013年《社會投資計劃》中的內容），並轉向權益保護的領域，將社會包容與平等作為獨立的目標，從而遵循民間社會組織與工會的建議。然而，擬議將支柱計畫付諸實踐的文書，卻僅僅依靠非約束性的協調與監督措施就接受商業部門與一些會員國所倡導的立場。儘管通常各種參與者能夠詳細理解最終成果，但是EPSR倡議的結果只是一份政治性、宣言性的檔案，其中列舉歐盟三大主要機構認可的一些原則和期望，唯一的創新政策是將一套新的社會指標（社會計分板）寬鬆的整合進整個宏觀經濟協調體系中。到目前為止，支柱計畫的附加價值還處在象徵性階段，而實現其固有潛力來激發歐盟社會層面的變化，則取決於計畫參與者的政治意願。

歐洲議會（EP）選舉的結果與2019年新任命的理事在這方面僅提供部分的前景。在歐盟等級，官僚和政治團體似乎都理解從超國家角度解決社會問題的重要性，而在歐洲議會選舉的宣言中，所有歐洲政黨都認為社會領域（social domain）跟2014年一樣重要或更為重要，特別是歐洲社會黨、綠黨和歐洲自由聯盟（前兩個政黨也直接提及支柱計畫）。此外，新任命的委員會主席Ursula von der Leyen在她的介紹演講和政治指導方針中明確提到EPSR，並提出採用一項「行動計劃」來執行。然而，各個會員國的角色在支柱計畫倡議的後續行動中同樣至關重要，正如其製定和通過時一樣，因此，考量國家等級的發展極為重要。

> 會員國的角色：以意大利為例

在意大利進行歐洲議會選舉的前夕，《歐洲社會權利的支柱》完全沒有進行宣言或公開討論，而贊成加強歐盟社會影響力的政黨（例如歐洲自由民主聯盟、歐盟綠黨與左翼黨）都在選舉中慘敗。這幾個政黨還根據各自所屬的歐盟黨派來製定計畫，並在競選活動中解決與國家或超國家有關的議題。即使上次歐洲議會選舉因國內政治議程的影響而幾乎沒有「歐洲化」，但這個現象不僅是在意大利，而是所有會員國都是如此，因此，就最終選舉結果而言，意大利的案例可能並不是最具代表性的。事實上，歐洲自由民主聯盟與歐盟綠黨，其親歐盟一體化立場，總體上都有在史特拉斯堡獲得新的席位，這有可能抵消民族主義者和疑歐黨派的選票。但是，在如社會類的政策領域中，成員國的角色仍然占主導地位，歐洲議會出現的高度政治分裂使歐盟社會層面的未來更充斥著不確定性。同時，這能夠為超國家行為者，特別是新成立的委員會創造機會，在其前任奠定的支柱計畫基礎上，促進社會領域的更緊密的融合。■

來信請至 Beatrice Carella
<beatrice.carella@sns.it>

> 人工智能是「誰的智能」?

Paola Tubaro,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Université Paris-Saclay, 法國

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類,人工智能才能成為「具有智能的」。
來源:Hitesh Choudhary/pexels.com

現今的人工智能(AI)之所以有如此卓越的發展成果,其實是立基於一大群人的「微型工作」之上——這些人會將物件以圖像的方式標記、記錄商業的收據、翻譯文字,並將他們大聲朗讀短句的聲音錄下來。如此簡單且重複性高的任務通常門檻不高,薪水少至幾分錢。負責處理這些工作的人也不是正式的雇員,而是按件計酬的分包商之下的員工,他們會藉由專門的網頁將工作分發,並透過智慧型手機或筆電遠端執行這些工作。

那麼,這些有如影子大軍般的工人是如何協助AI呢?以Siri或是Alexa這類以AI科技驅動的語音助理為例,在他們能夠辨認、理解使用者的要求之前,語音助理必須先接收大量的人類語音作為範本,例如「今天天氣如何?」。在接收這些範例之後,電腦會「學」到,哪些句子雖然有著音色、語調,甚至地方口音或背景音的差異,指的卻仍是相同的意思,並接著變得能夠辨認新的、不同使用者的類似要求。負責處理這類微型工作的員工,除了需要製造這些語音範本,將他們詢問天氣如何等等語句的聲音錄下來之外,AI製作者也需要他們來協助測試這些「智慧型」助理的功能是否如預期。

微型工作的模式最早是在2000年代初期,因亞馬遜公司的「土耳其機械人」(Mechanical Turk)而變得普及。由亞馬遜內部的員工先負責整理產品清單,再將清單內容開放給外面的客戶,而這些客戶會再將這些HITs(Human Intelli-

>>

gence Tasks)發佈在網路平台上讓微型工作者執行。亞馬遜給了這樣的設計一個再適合不過的稱呼——「人工的人工智能」,強調在遇到一些電腦無法處理得比人類更有效率的工作時,將這些工作外包反而是更好的選擇。現在很多其他的網頁或應用程式也依循亞馬遜的例子提出不同的方案,例如澳洲的Appen、德國的Clickworker、美國的Lionbridge和Microworkers等,族繁不及備載。

這些微型工作者身處在哪些地區呢?由於一部分的工作在線上就能完成、也不需要真的待在特定的空間內(例如從一堆沙拉的圖片裡辨認出番茄的圖片),許多工作者生活在工資較低的國家。在這個情況下,微型工作的地理分佈,也再現了外包產業廣為人知的的模式。然而,也有一部分的工作因為需要地方的知識或技能而無法在海外完成,舉例來說,由於語音助理的功能會銷售至不同國家,為語音助理錄製的語句範本,就有賴能使用相應國家的語言、甚至其腔調和方言的工作者來完成,而多數「土耳其機械人」的工作者的確也都是來自美國。我們去年也在法國這個同樣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設置了一個名為「數位平台勞工」(DiPLab)的研究計畫,並找到了許多的微型工作者。

在法國這樣的地方執行微型工作的,又是什麼人呢?我們的問卷顯示,這些人不是只有學生或是千禧世代:有超過百分之六十的人介於25到44歲之間,而且他們在進行這些線上的微型工作之外,同時還有著另一個例如衛生、教育、公共服務等各種性質的行業作為主要工作,微型工作則是他們賺取額外收入的來源。很諷刺的是,在那些有著較高門檻的微型工作裡面,微型工作者相比於一般大眾其實有著更高的教育程度:在法國,有超過百分之四十的微型工作者至少是有大學學士學位的。另外,有比一半再多一點的微型工作者是普遍已經有家庭的女性——由於她們比其男人更可能從事兼職工作,且通常更需要依賴另一半的收入、也投入更多時間在家務勞動上,她們會利用工作與家務之間的時間來進行線上的微型工作。為工作帶來的額外收入當然是好的,但附加於正式工作以及家務勞動之上的額外負擔也成為隨之而來的代價,使得她們的休閒時間所剩無幾。

微型工作揭示了一個檯面下頗具規模的經濟問題。有超過百分之二十的法國微型工作者生活於貧窮線之下、薪水只有全國收入中位數的一半,這樣的人口卻僅佔總人口數的不到百分之十。與這樣的背景相對的是,線上微型工作其實是想要試著解決這樣的問題的:在我們的問卷調查中,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提及,他們之所以投入微型工作,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需要錢;然而法國的微型工作者的月收入,卻有著不平均的分配。當一部分在工作上較為「活躍」的人藉全職(或幾乎全職)的微型工作能夠有1500到2000歐元的月收入,絕大多數「看情況」上工的微型工作者每個月的收入卻比起平均少了21歐元。

如果說微型工作對於特定的人而言——對於那些在勞動市場中求職選項較少、或是需要較彈性地安排工作時間的人而言(例如前述那些需負起家庭照護責任的人),有機會成為提供他們生活支持的方式,其卻也存在著特定的風險。微型工作沒有任何形式的社會保護機制,沒有健康保險、也沒有退休的福利。在現況下,微型工作的經驗並不能直接地為一個人的職業生涯帶來助益:即便你已經在其中一個微型工作平台上獲取了一定程度的工作聲譽,你也沒有辦法將之轉換到另一個平台上。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微型工作是會帶給工作者負面情緒的。他們時常不知道自己的顧客是誰、也不清楚工作案的目的,工作對於他們來說像是失去了意義一般。就像我們的其中一個調查對象,由於並不理解自己的工作對於AI發展的貢獻,他時常感到疑惑:「到底為什麼我要在圖片裡的番茄周圍畫出一個圓?」此外,當完成的工作案被顧客駁回、並因此而不支薪的時候,微型工作者沒有辦法對這樣的駁回提出意見,也無法知道被駁回的原因。甚至,微型工作者們是在分離的空間裡面進行單獨作業的。由於他們各自在家裡工作,沒有一般辦公場所會有的共同休息區,即便是在網路上,也沒有微型工作者專屬的網路空間可以提供互動的機會。不管是對於行動者或是工會的能動性來說,這樣的基礎設施都是必要的。

由於微型工作是推動AI這項前沿科技發展的要素之一,且其從事者多數處於較弱勢的處境,針對其帶來的問題,我們應該嚴肅地思考可能的應對方式。微型工作的網路平台與應用程式等公司,應增進其運作透明度,並提供予工作者適當的人際支持服務;工會和政策制定者也應為非典工作者創造更多不同形式的保護措施。■

來信請至 Paola Tubaro <paola.tubaro@lri.fr>

> 新奇博物館

Lévio Scattolini, State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UERJ), 巴西

電子加密貨幣為一個更加民主的金融體系帶來了希望。
來源：Worldspectrum/pexels.com.

質疑著「資本主義如今還能為人類文明的成就帶來什麼？」的人們，在面對科技的發展願景，例如所謂的科技／資訊時代時，也傾向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對這些人而言，人工智能、機械學習、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加密電子貨幣、甚至智慧型手機，這些人類心靈與身體的衍伸物，並不被解讀為一個新時代即將來臨，反而是被視為未來時代的封閉體制。即便找到證據證明了這樣的假設，也無法回答一個更為久遠而重大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總是看見新的體制和方案與最初為其賦予生命的理念漸行漸遠，最終又以新的樣貌重構過去？

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有許多層面，而我想要強調其中一個較為迫切且具體的層面，以揭示在這類爭論中通常會被忽略的、根源於社會的面向。金融體系在全球各國默許及支持下，作出難以想像的濫用行為，最終導致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而在創新理念中，最先廣為人知的一種電子加密貨比特幣是針對上述濫用行為的一種反抗措施。事實上，作為抗議號角，《泰晤士報》一份關於英國政府意圖在2009年1月3日對銀行實施第二輪救助的報導便被寫進比特幣的原始程式碼，作為比特幣發行日的時間戳記。此外，這項科技結構確實是為了將掌控金融系統的權力從那些「中介人」身上拔除，重新分配到一般大眾手中而設計。

>>

傳統金融體系被認為問題在於，其在交易驗證和貨幣發行上完全倚賴著對中央機構的信任。換句話說，正是那些如私人或中央銀行的金融機構，要負責確保當A擁有特定數量的金錢、並將這些數量的金錢匯給B之後，便不能再次使用這些金錢。我們將執行特定任務的權威賦予金融機構，並且期待他們會做到最好。這對現在大多數人來說並不成問題，因為這些事情難以被察覺、且離日常生活太過遙遠；然而這對於城邦政府而言——特別是在一個所有事物都是為了被交易而生產以獲得金錢的社會型態下——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

在這樣的環境下，創造一個任何想要加入的人都能夠觸及，並能夠將交易透過共同的協調機制記錄和驗證的去中心化分類總帳網絡，這樣的想法便顯得頗為適切且有趣。若是考慮到這個網絡的特性——不僅可容錯、內建了無法調降的2100萬貨幣發行量，甚至在超過十一年之間經過多次攻擊，卻仍然沒有太大程度的結構損傷——就更是如此。事實上，比特幣的分配系統協調實在建構地太過完美，以致於其發展成了一項獨立的科技，以及一系列被稱為區塊鏈的裝置。

2019年，比特幣在市場價值上抵達了2.25兆美元的高峰，並在一年內有著超過1.2億筆的交易被記錄在原始的數位網絡中。但我們應該於此就下定論，將其視為一個對金融體系掀起革命、賦予一般人民權力的存在嗎？先別急著這麼做。從2014年至今，在經過不穩定和充滿波折的開端後，金融機構、企業和較大的投資者都將目標轉移至電子加密貨幣上，開始大量地投資和研究這項科技。「一般使用者成為多數並掌控比特幣的網絡」這樣的理想，在現實中遭遇了重大的挑戰。如今比特幣的「挖礦」被大規模的「農場」所掌握——農場一詞指的是那些擁有機器、能源、資源（或說資本），而因此能將「工作量驗證（proof of work）」處理得更好的大型複合公司。值得一提的是，Facebook最近才宣布要和一些全球最大的企業合作創造自己的電子加密貨幣「Libra」，而這樣做的目的則在於達成不管是比特幣還是其他種加密貨幣都無法做到的：讓這樣的貨幣變得普及。這意味著我們將會目睹，一個數十年來一直不當地從數十億人的手中偷取資訊、同時也是世上最大的社交媒體平台，和大企業合作以建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中央銀行，其不只是私有的、還知道使用者的所有資訊。

於此我們可以看出，批判分析作為身處這個世界中的我們得以適當地定位自身行動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就像前面所強調的，從務實的角度來說，現今的金融體系的問題大致上在於，人們倚賴著對於中央機構作為「中介者」的信任，並由此而發展出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重新創造一個開放且去中心的「信任的網絡」。然而，會不會其實，問題並非來自金融體系的形式，而是出自這個體系的內容？我想說的是，我們怎麼可能有辦法將我們的時間與金錢託付於社會中最龐大的中介者上，同時試圖藉此創造一個「去中介者的社會」？金錢不就是中央查核機構不斷成長茁壯的源頭嗎？不就是不斷地累積、獲取金錢的內在邏輯，造成了集中化與中心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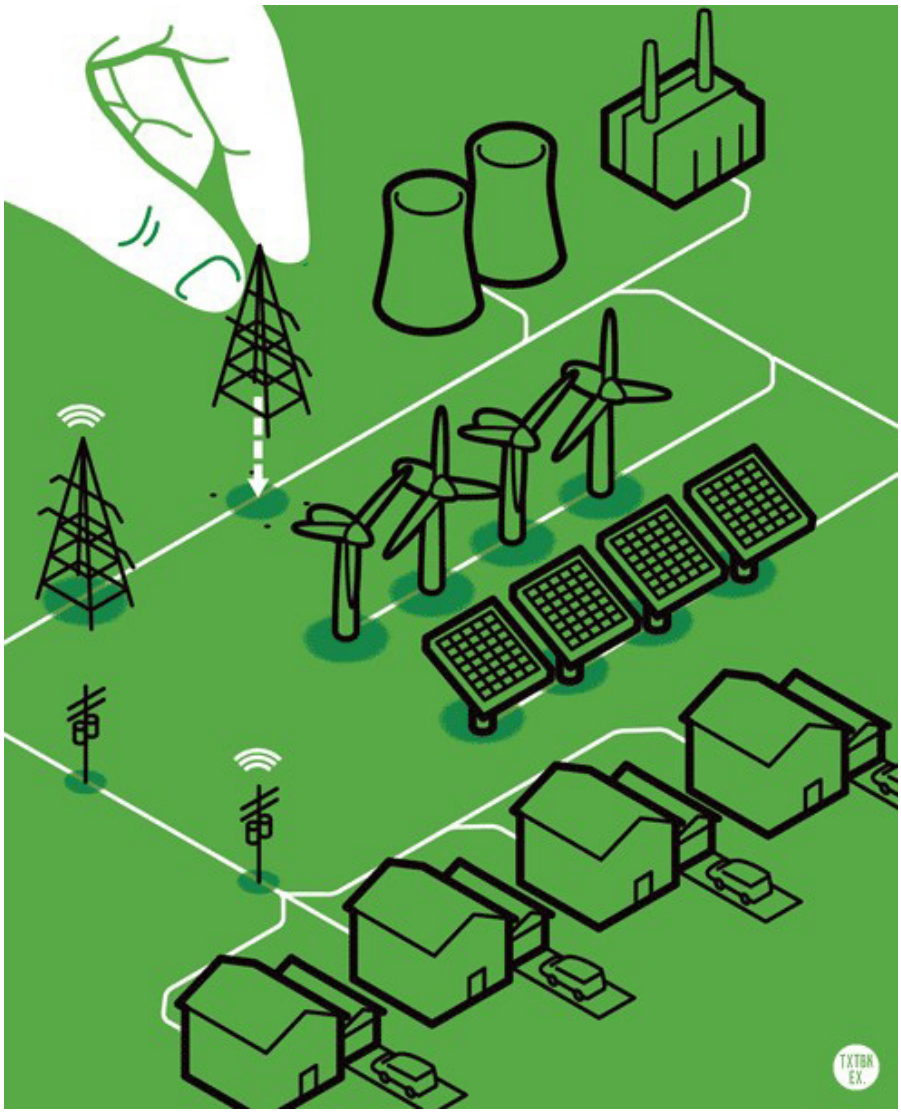
我並不是要說比特幣或是其他的那數千種電子加密貨幣是毫無價值的，而是想要指出，若我們將社會組織的資本主義形式視作理所當然，若我們拒絕看見金錢對於社會互動的影響，這些新的科技將會因為總是不斷地重建過去，而註定走向毀滅，那些必要的社會條件在沒有資本的情況下是無法自我再製的。在揭示了物價的升值的矛盾變化，我們也許能夠對於這個議題有更完善的理解，並由此找出更好的解決方式、結構或是科技，引領我們走向不同的未來：生產生活的一種新的物質過程。

■

來信請至 Lévio Scattolini
<leviosj@gmail.com>

> 數位化社會的永續需要什麼?

Felix Sühlmann-Faul, 德國



再生能源的智能分配涉及到數位化。
來源： James Provost/Flickr.
保留部分權力。

世界上有許多事物能告訴我們數位化有著怎樣的意涵。舉唱片行為例，我們都曾會在電台上聽到某些我們覺得喜歡的音樂，或是因為被朋友推薦，而來到唱片行買下某些音樂商品。其作為一種物質上的存在，成為了我們的財產。如此日常的舉動在如今已經幾乎消失了。立基於平台商業模式之上的串流服務，讓我們得以直接取得數以萬計的歌曲，取代了過去的唱片行。音樂產業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其中一個造成這項轉變的重要原因，是如今產品的核心意義由數據掌握。串流平台的商業模式在多數情況裡會透過蒐集使用者的許多資訊來完成運作，例如我們習慣聽的音樂種類、什麼時候聽、聽的頻率、在哪裡聽這些音樂；或是我們的性別、有沒有小孩、住在哪裡、家庭收入。

這些資訊便是這類平台能獲得重大成功的原因：他們對於我們的喜好和想法有深刻的了解，並能夠預測我們的行為。他們提供的服務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這些服務會隨個人的差異而調整。平台也會將這些搜集到的資訊轉賣給廣告公司，以針對使用者投放其可能更容易有興趣閱覽的廣告內容。上述的這些現象，便是現代數位化的其中一個重要意涵：資本主義與科技之間有著強大的連結。

>>

這和數位化時常無法與永續性達到平衡有直接的關係。1987年，布倫特蘭委員會對聯合國的報告中提到，「永續發展指的是能夠在符合現下需求的同時，也能兼顧未來世代需求的發展方式。」也因此，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以及他們的下一代，都應該享有過上「好的生活」的權力。這意味著什麼？——這一個問題必然與文化有關。在人文主義與啟蒙運動的理念形塑下，西方社會由相對應的價值組成，像是民主基本權利，自決權、多元性、隱私權、環境權，以及任何異議下的「自由」。然而這些價值大部分也都受到數位化的影響，而數位化是被。舉例來說，藉由完全地掌握使用者的各種資訊，而得以成功的串流平台，並沒有辦法確保我們的隱私權得到保障。更進一步來說，環境的保護一直以來都不是經濟利益所追求的目標——這一點在進入數位化時代後也未曾改變。

數位化倚賴於原物料的生產和運送，以及相關裝置與基礎設施的共同運作。僅僅是數位裝置的能量使用量就站了全球電力消耗的10%。如果數位化的趨勢持續延展，這個數值會在2025年時來到20%；相關資訊與通訊科技的生產與使用所產出的碳排放量站全球碳排放量的比例，也會從3.7%提升至8%。原物料的生產會在生產國帶來極度嚴重、且不易消失的問題。剛果共和國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剛果是鎢、鉭、錫、鈷、黃金的大出口國，這些原料對於製造硬體數位設備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礎材料。想當然的，生產這些原料會造成一些常見的環境問題，例如地層侵蝕、地下水中毒、物種滅絕。不只如此，其在社會層面更是有著巨大的影響：一場血腥的內戰讓國家變得千瘡百孔。數個反抗軍隊將這場戰火延燒了30年，導致了數百萬的人民傷亡。生產硬體數位設備所需原料的礦場如今被反叛勢力控制，並以原料的銷售所得來供給軍火費用。這便是「戰爭礦物」一詞的來源，其帶來了一連串的苦難：飢餓、性暴力、疾病、奴隸、童軍。

可喜的是，在另一方面，有許多地區的永續唯有透過數位化工具才能夠達成。最一開始的例子是人們漸漸開始傾向使用再生能源。由於再生能源的生產具有去中心、難以預測、在一日當中的不同時間區段中出現、有時只有很小的生產量等等特性，若要有效地利用再生能源，數位化是無法被忽視的。如此善變的再生能源，需要在及短的時間內儲存與分配，而這些工作只有透過能夠自我學習的電腦科技才能辦到。

另一個例子是永續的交通運輸。要讓石油運輸工具、市中心的大車潮以及細粉塵污染，就需要大量地減少使用汽車的乘客。然而對於替代的運輸方案，人們卻時常有很大的資訊落差。這些運輸方式有不同的供給者、不同的收費、不同的移動時長等等，人們難以同時取得這麼多的資訊。不過身處於一個智慧型手機已經如此普遍的社會，要解決這樣的問題其實非常簡單。在德國已經有許多的研究計畫處理了這個問題：透過增加一些當地公共運輸業者的手機應用程式、並在其中加入其他當地不同業者的交通資訊，人們可以直接比對共享汽車、單車租借、公車、火車等不同的交通運輸方式，並能知道旅途需要多少時間、哪種方案有最便宜的價格、要如何結合不同種的運輸工具抵達目的地，甚至能透過應用程式預定票券或付費。數位化讓永續旅行變得更加容易。

> 數位化的時代將我們置於怎樣的處境？

有許多研究顯示，永續性對社會而言有其重要性。然而實務操作上，永續並不是一件容易達成的事情。人們通常難以立刻就拋棄汽車、或突然就不搭飛機——這就是政治力必須介入的時候了。可以操作一些簡單的政策，例如降低購買數位設備的稅收，或是立法規定所有的電子產品都要是可以在修復後重複使用的。然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應該要以合理的價格買進原物料。對於產出這些礦物的國家，應該要有與其遭受的環境與社會傷害相對應的經濟補償。這樣的措施當然有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但藉由課取更高的原料稅收，其也能帶來後增長經濟的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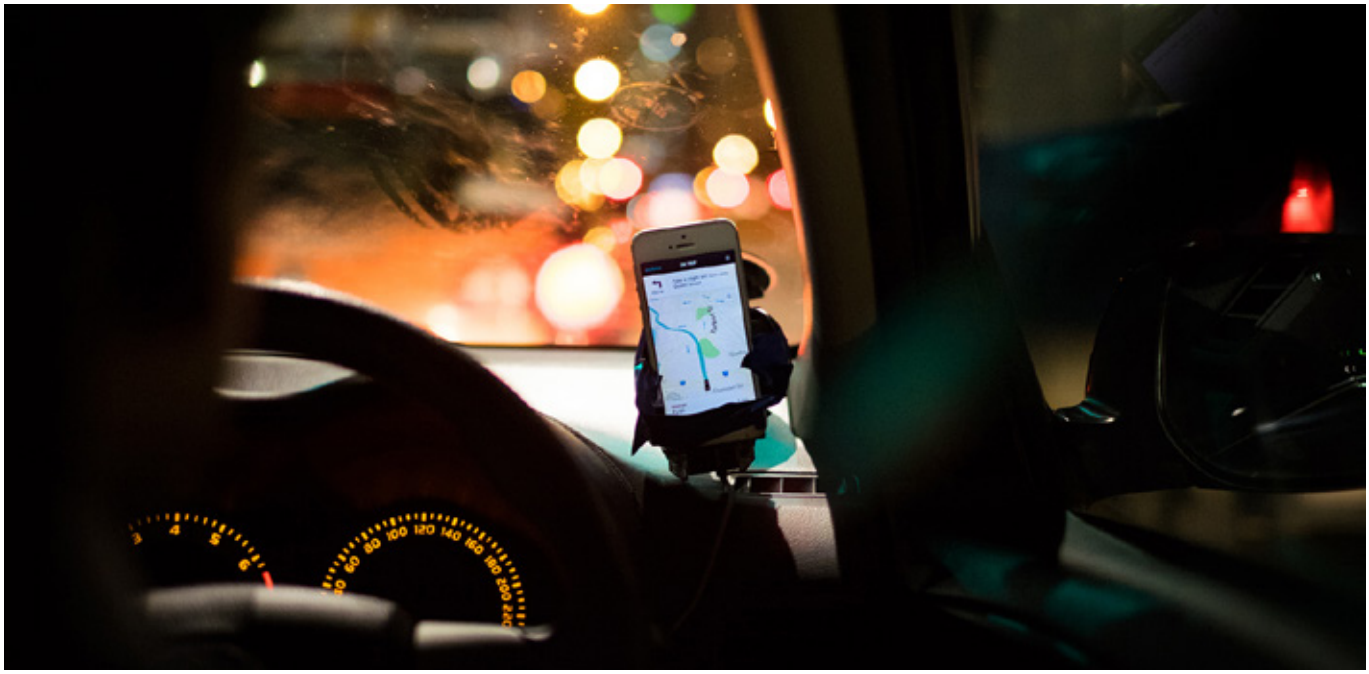
數位化的社會將創造一種更為永續的生產與生活方式、降低能量消耗以及環境破壞的風險，然而這是一項需要協力完成的事情。不只是完善的法條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人民作為個體，也應透過政治參與、投票、並主動適應這樣的生活，以呼應數位化的社會趨勢。永續的基礎來自於自給自足的條件，但數位化則會降低消費的門檻。我們需要特別留心注意這個事態的發展。■

來信請至Felix Sühlmann-Faul
<kontakt@suehlmann-faul.com>

> 公平工作組織：

零工經濟的行動研究

Srujana Katta, Kelle Howson, Mark Graham,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英國



過去十年裏，商業性的點對點乘車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交通工具。
來源 Noel Tock/Flickr. CC BY-NC 2.0.

來自印度的公司 Ola Cabs 是一間共享乘車服務的廠商，這類公司的商業模式倚賴於使用數位平台來為勞動的供給者與需求者進行配對，並且在全球都有增長的趨勢。Ola Cabs 的手機應用程式提供有需求的乘客和附近駕駛聯繫的功能。此種商業勞動平台便是我們所說的「零工經濟」，公司會以一些數位平台為媒介，和有工作需求的人簽下合約，執行短期、不固定性質的「零工」，而這些平台通常有著一套嚴密保護的演算法為運行基礎。零工經濟以演算法分配、管理僱傭狀況的模式，為其拓展了多方面的經濟活動，涵蓋了共享乘車、包裹運送服務、家務勞動工作和一般自由業等等。

Ola Cabs 作為一個典型的零工經濟企業，利用自由、彈性等勞動敘事，招募「駕駛夥伴」來為公司開車。Ola Cabs 在其網站上向抱持理想的駕駛們保證這份工作有著「彈性工作時間」、「工作自由」以及能「保有尊嚴」等條件，以符合零工經濟最初設置的標語。除了讓人們在旗下駕駛自己的車之外，Ola Cabs 也會以一天10到16美金的價格將汽車租借給沒有車的人。這些充滿駕駛於是能夠在繳交56美金左右的、無法退還的首期款，以及約293到432美金的保證金之後，「零風險地駕車」。

在 Ola Cabs的敘事中，駕駛人作為自我賦權的野心家，將自身從傳統工作的束縛中解放，並周旋於有趣的任務之間。零工工作表面上呈現出能夠自我管理、有效利用現有資產、騰出更多時間陪伴家庭或追求其他事情等等較吸引人的一面；其魅力來自於提供了工作者對於職業與個人生活的各方面有更大掌握的可能。然而現實通

>>

常與這些承諾有天壤之別。由人類老闆進行公開管理的方式，已經被更隱蔽、且於現代更普遍被使用的演算法管理模式所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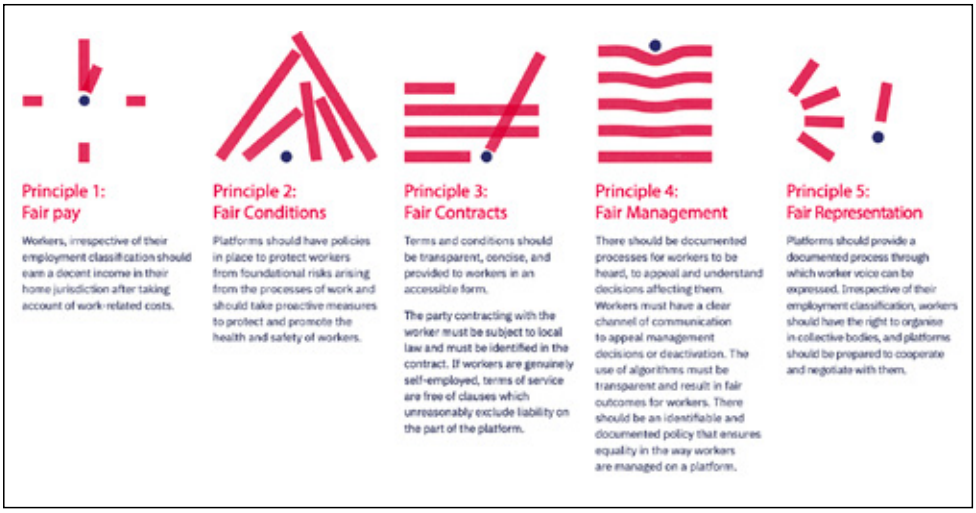
在2019年十二月，經濟時報的一份報導指出，Ola Cabs 在遭到一位乘客投訴駕駛在開車時睡著、差點出車禍之後，將一位孟買的駕駛停業。駕駛表示他在這之前已經駕駛了超過二十個小時。在表面上，Ola Cabs 將其停業是為了保證乘客及駕駛安全的合理處置；然而此事件也顯示了共享乘車服務，或是整體的零工經濟，有著某種程度上的潛在結構問題——低薪資、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以及相關規範的缺乏。報導中引用了某勞動組織的一段話，很好地詮釋了這樣的情況：「他們如果不像是14、15小時這樣長時間駕駛的話，就沒有辦法負擔 Ola、Uber 等公司所設置的每日平台使用費。」

零工經濟平台通常宣稱其僅是將出賣自身勞動力的人，和想要購買的人牽線的科技公司而已。根據這樣的邏輯，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中，平台都將零工工作者分類為「獨立承包商」、「自營職業者」或同等人員，而不是受雇員工。這樣的分類方式掩蓋了實際上平台與工作者間的控制關係——平台訂定了工作條款與給薪方式，並施行高效的網絡治理。在合約中動的這些手腳，導致越來越多的零工工作者無法被涵蓋在勞動法條中，並因此無法受到像是病假、國定假日支薪，或是退休金等等勞動權益的保障。平台會將營業成本轉嫁到工作者身上，例如汽車的租借費、維修費、保險費、燃料費，工作者還要負責計算並繳納稅金；在公司不斷擴展規模導致薪水有減少的趨勢，以及被設計會給予工時較長者獎勵的遊戲化數位介面下，原本應有選擇工作時段的自由也受到限縮。更糟的是，當勞動力供給過剩造成某些時段的工作機會太少、等待下一份工作時不支薪的等待時間延長，平台也沒有義務保證工作者的最低工作量。勞動力過剩同時也意味著顧客在需要服務時很少需要經過等待。上述的種種因素使得工作者被迫需要工作更長的時段，也因而承擔了更大的風險、危及他人和自身的安全，就像這位差點睡著的 Ola 駕駛員一樣。

在 Ola Cabs 和印度發生的這些事情都不是特例，低薪、過勞、暴露於高風險的工作環境——類似的現象於全球的零工經濟中重複上演。上述情況可以、也正透過如針對員工就業狀況以及平台之義務設置條例等方式得到處理。為這些措施奠下基礎的，是由下而上的集體行動、工人組織，以及第三方試圖喚起大眾對此議題的意識和提倡更為公平的作為所付出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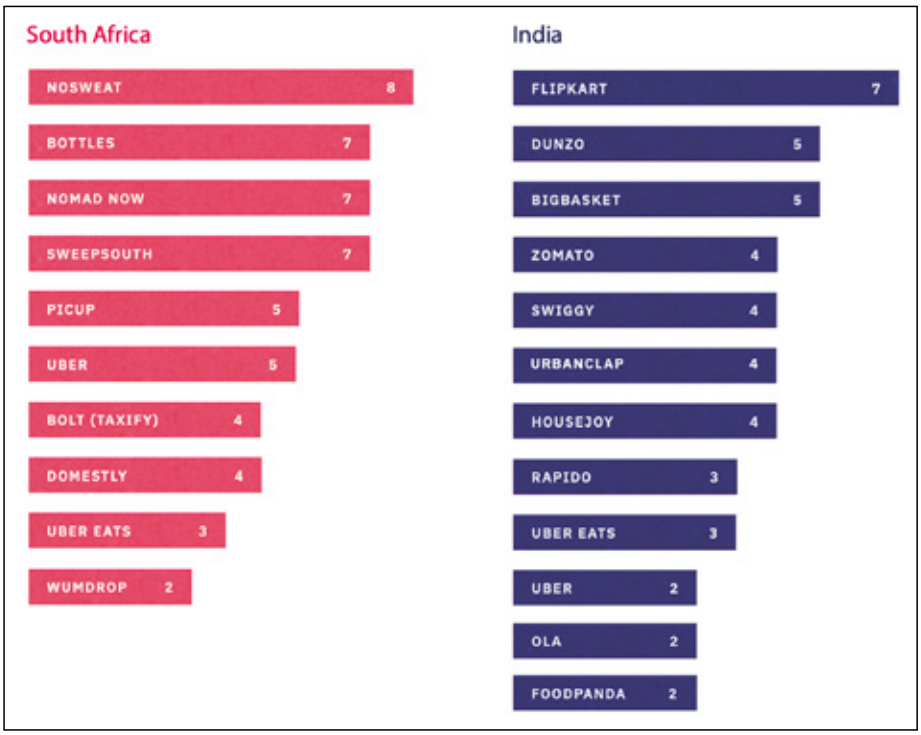
正是依循後者的精神，牛津大學下的行動研究計畫「公平工作組織」在2018年成立，社會科學家與勞動律師在其中合作、試圖為零工經濟中的不公平現象提供解方。在聚集了來自亞洲、非洲、歐洲，超過300位零工工作者的案例之後，我們得以發展出五個關於平台工作的公平原則：公平的薪水、公平的勞動環境、公平的合約、公平的管理、公平的代表。

我們每年會發表針對零工經濟平台的研究，其內容包含了勞工與管理階層人員的訪談，以評



公平工作原則。
來源：公平工作組織。

>>



2019年南非與印度公平工作排行榜。
來源:公平工作組織。

估平台是否違反這些原則。接著我們會以十分為滿分為這些平台打上個別的和相對於其他平台的分數,並在「公平排行榜」上分別顯示這兩種分數。我們會依據不同地區的環境差異調整五項原則的門檻,例如「公平的薪水」這樣的原則在評估不同地區時就會有不同的詮釋方式。較高分數的平台會獲得使用我們的風箏標記的權利,以表示其是公平的資方。

我們期望能藉此提供勞工、企業、消費者以及監管機關一套平台經濟的支持系統,勞工賦權、永續經營、工作機會增加等展望並得以被想像、實踐。

在收到乘客的投訴後,Ola Cabs 對過勞的駕駛採取了立即的紀律處分和糾正措施,包含要求其參加輔導。然而也許並不是全數的責任都該被丟到這位駕駛頭上。要勸一個人不要那麼疲累,或是不要那麼依賴不穩定的收入來源,是不可能的事情。若 Ola Cabs 或是其他類似的平台在進行員工管理時更積極地將公平工作原則納入考量,零工工作者也許便能有更安全與公平的工作處境。若能有公平的淨收入(薪水),且平台沒有加班獎金這類會針對過勞給予獎勵的制度(勞動環境),駕駛較可能選擇結束一天的工作,而不是在一整天的勞累之後開始另一份工作。如果能更清楚地向工作者說明付款的義務,他們便能在簽下合約之前有機會審慎衡量自己的選擇(合約)。當平台具有互動機制的正當程序(管理),工作者便能對其處分提出申訴、並由專人審理案件。能擁有平台的獨立集體機構認證(代表)的工作者,也更有可能能夠要求更合理的合約。相反地, Ola Cabs 和多數的其他平台則沒有做到這些;他們不只將成本和風險轉嫁在工作者身上,還讓工作者成為不安全工作環境的咎責對象。

從根本上來說,我們希望透過公平工作原則來強調,不安全的工作條件在現代的平台經濟中是不可被接受的、不必要且不自然的現象。在越來越多的勞動領域中出現的各式各樣靈活的應對措施,為這些難以爭取的勞動權益奠下基礎。即便現況看來難以改變、我們也難以觸及這些平台,但他們其實是很在乎大眾的聲音的。對於想像和實現更公平的未來,平台的使用者們(包括工作者和消費者)有著我們難以想像的影響力。■

來信請至:
Srujana Katta <srujana.katta@oii.ox.ac.uk>
Kelle Howson <kelle.howson@oii.ox.ac.uk>
Mark Graham <mark.graham@oii.ox.ac.uk>

> 資本主義、階級、爭論

Donatella della Port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Florence, 義大利

2019年香港革命。來源:Studio Incendo/Flickr. 保留部分權力。

今年是1969年「熱秋運動」(Hot Autumn)的第五十週年紀念日,使許多像是Colin Crouch或Alessandro Pizzorno的社會學家談論「階級鬥爭的復甦」,這告示著許多全球大規模抗議浪潮的出現。這包含著數百萬人的抗議遊行以及公民不服從的反抗(civil disobedience),在黎巴嫩、智利、加泰隆尼亞還有香港等遙遠的各地同時爆發。在2019年的「熱秋運動」中,對抗極端不平等與腐敗菁英的鬥爭,與2010年開始的反財政緊縮運動(anti-austerity protests)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全球公正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產生了共鳴。

當財政緊縮的抗議定期地出現並接近2010年代尾聲時,一些針對女性暴力、全球暖化抗議動員的風聲蓋過了這些先前運動的架構,並將這些議題定位在對現有社會與政治關係的批評之中。其中,流動網絡(fluid networks)連接了群體,而這時常發生在第一次動員群眾上。而未來星期五(Fridays for Future,又稱氣候大罷課)、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與一個都不能少(Ni Una Menos)等社會運動將女性暴力及自然環境的破壞與資本家的剝削議題聯繫起來。2019年熱秋運動的

>>

大規模動員不僅深植於國家分歧上，同時也對全球資本主義下增加社會不平等、限縮公民權利與政治自由的發展表達怒火。而有時，在街道與法院上殘酷鎮壓公民不服從的行為，引爆了政治化螺旋中更長遠的激進抗議。

儘管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危機帶來了許多的不滿，人們時常以分裂形式來表達抗議，但資本主義作為一個觀念及研究主題，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仍處於邊緣地帶，對於階級以及階級衝突的分析也是如此。然而，自從2008年的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後，人們越來越關注社會衝突的結構基礎及其在制度化政治(尤其是爭議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中的表達。關於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資源調集(resource mobilization)以及框架過程角色的公認假設，則是需要考慮到抗議活動中的社會經濟地位以進行更動。如同我在隨後的文章中所論證的那樣，為了將資本主義帶回抗議活動的分析之中，我們須要將有關社會運動的文獻與新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重要學術貢獻聯繫起來。

> 資本主義及新型社會運動的轉變

勞工運動的研究指出，資本主義的長期轉變導致了產業勞工及其階級意識、組織能力的下降。與此相呼應的是，社會運動研究中的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證實了工廠外部分裂的擴張、新的集體身份的形成，以及對社會及市場中階級制度的抵抗。特別是自1970年代以來，當評估階級分裂的狀況已平靜下來之後，事實上一些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正研究表明了他們對於後工業(post-industrial)與後物質(post-materialist)新運動特徵的關注。

從理論上來談所謂的新社會運動，像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Alberto Melucci和Alain Touraine的作品，都挑出了一些程序化社會(programmed society)或後工業社會中社會運動的特徵。當資訊的控制成為了社會力量的主要來源，可以預期衝突將從工作場域轉移至像研究與開發、資訊的闡述、科學與科技，以及大眾媒體等領域上。新衝突中核心的行動者不再是與工業生產相關，而是與認知與象徵性資源的使用與控制相關。在當代社會中，投資個別(或獨立)自動化行動中心的建立，與加強控制各種人類行動動機有著更緊密整合的需求，兩者之間勢必將有所衝突。雖然Touraine跟Melucci兩人對於主要的社會衝突及其媒介都採取了一種複雜的觀點，強調了稱之為階級意識發展的重要性，但卻在「新社會運動」社會基礎的實證研究之中，關注於抗議者們在社會中的階級位置。隨著一股對於部分運動及國家進行概括的傾向，研究指向一些中產階級的位置，像是從事公共服務的白領族，比起像是藍領族，更願意去參與這類爭論類型的活動。

> 階級衝突的再現

儘管這些理論與實證式分析有助於闡明一些在世界的特定區域，與福利國家擴張的特定時刻下爭議政治的某些特徵，但有關勞工衝突結束以及作為中產階級舞台的預測，被證實是不正確的。

首先，不僅西方的資本主義形式不會被證明是一種其他經濟體與社會走向的模式，甚至在這之中，會比程序化社會的理論家所預測的發展出更多剝削的形式。產業勞工數的下降不會導致勞工剝削的減少。相較之下，隨著勞工狀況的不穩定化(precarization)，中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zation)更是持續在受到關注，許多行業的自治權利、薪水，以及服務行業中白領階級的工作都在減少。正如David Harvey參考了Karl Marx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樣，為了解決過度積累的問題，透過金融投機賺取獲利已成為了通過生產賺取利潤的替代方案。再加上擴張再生產的積累導向形式，將一部份的盈利重新投入再生產，通過剝削他人使資本積累增加，令人聯想起那通過非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特殊關係擴張的原始資本累積方式。

圍繞著工作條件重現的衝突所針對的是一些互相連結的問題，而Michael Burawoy分別將這些問題分類為反對再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社會運動(移除了已實現的社會保護)；反對新領域活動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社會運動；以及反對前商品化(ex-commodification)的社會運動，其中後者是定義為一種從市場驅逐的前商品。例如：從勞動市場驅逐的前勞工。如同累積資本的邏輯衝擊了共同動員的形式，也考量到金融資本主義(financial capitalism)的特定特徵增長了階級分裂，我們

>>

於智利的抗議活動，2019年。來源：Diego Correa/Flickr. 保留部分權利。

可以期待抗議運動能夠跟隨於不同的邏輯發展。

> 晚期新自由主義的階級衝突

除了對一連串社會形態的廣泛趨勢進行辯論之外，在注意新自由主義中階級衝突的危機復甦時，還必須注意資本主義演變的中期週期性過程。Karl Polanyi在他的主要著作《巨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裡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社會保障與自由市場之間有著雙重的運動。作為第二次的巨大轉變，新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市場對社會極端支配的意識型態上，而不是在於市場的社會支配上。

然而，在Polanyi的運動及反動運動(countermovements)中的共同趨勢卻鑲嵌於不同種類且共存於同一歷史期間的資本主義。首先，正如世界體系的研究方法指出，資本主義採取了多樣的形式於它的核心(core)、半邊陲(semi-periphery)、邊陲(periphery)之中。一些勞工運動的研究曾批評過概化特定的地緣政治(geopolitical)於全球水平的趨勢，也就是說西方世界中的產業勞工數量可能在下降中，但這並不是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區域內的情況。第二，Peter Hall、David Soskice與其他學者曾指出幾個具有自由市場經濟的不同資本主義變體，其中市場是互動與關係的主要成分，正與協調的市場經濟體制相反。最近的研究正在處理第二波巨變中資本主義不同適應性下的變化，以及它在經濟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中的危機。研究不滿於其採取了不同的形態，與特定的特徵、時間性有關，以及金融危機中的強度與政治對其採取的態度。在核心與邊陲，如同Beverly Silver所描述，Polanyi式的為捍衛舊權利的階級鬥爭，是以不同的方式與馬克思類型的社會運動互動，挑戰現存的生產體系。

> 社會運動的能動性(agency)

儘管這些批判政治經濟(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內的迴響為社會衝突的階級基礎提供了許多實用的見解，但是這些建立自發性組織與佔據制度性權力的各種社會團體的能力地位，卻產生了

>>

一些社會運動研究可能有助於解決的未處理疑問。而社會運動研究可以做到的，那就是闡述反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s)或是反動運動，是如何透過能動性及一個廣闊關係的脈絡下被創造出來。在做到這一點時，就動員資源與自發性政治層面兩者的作用而言，其可能有助於將階級的分析脈絡推離結構主義(structuralist)的研究取徑。

首先，儘管研究新社會運動的學者正在討論資本主義不同的發展階段，但他們通常將注意力擺在衝突結構上的決定因素上，同時又強調身份過程的重要性。就這個意義上，他們反對並爭論馬克思主義中對結構主義的詮釋，而新馬克思主義(neo-Marxist)或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t)的研究取徑能夠有助於克服這一挑戰。然而，這個過程中卻沒有對那些特定機構的發展，以及能夠解釋從結構到行動上轉變的概念資源進行足夠的研究。

在這一點上，新社會運動的研究取徑所指出了一些要素，仍然與理解現代衝突相關。舉例來說，知識控制的重要性對比了生產方式(means of production)的物質所有權的式微。抑或是在當今的動員裡，在福利國家中以拒絕對於公眾的等級制度(hierarchical)來支持平民百姓的定義仍有其重要性。而這並非偶然，在馬克思主義對新自由主義時期社會運動的最新分析之中，像是其中一位Colin Barker的著作，就廣泛地參考了Melucci與Touraine的分析，尤其是他們強調了反抗論述的重要性，而這個論述奠基於激進需求的認知並克服具主導權的常識。同樣地，對於爭議政治的一連串研究，強調了抵抗資本主義的象徵性及物質資源的累積作用，也強調了特定抗議手段的鞏固、制度管道的穩定化，以及以及結盟與網絡的作用。

從最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危機中的局勢經濟(conjunctural economic)與政治發展的型態與強度，都與爭論的形式與強度產生了相關的影響。對於歐洲邊陲地帶社會運動的比較分析，挑戰了勞工社會學與社會運動研究中的普遍假設。這意即著當勞工有結構上的優勢時，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s)會在這個富饒的時期開花結果。而經濟成長意味著有更高的利潤可以用於增加工資與稅收，以支持社會福利政策的支出。這樣的研究顯示，越有這種危機的地方，特別像冰島、希臘、西班牙這類的國家，越容易觸發更高水平的社會活動。其中會出現新的行動劇本(repertoires of action)與新的組織形式、主張，甚至能夠使人取得政治上的勝利。儘管如此，對於具爭議的行為者在富裕時期和危機時期所面臨的不同挑戰進行反思仍有意義。正如一些針對勞工運動進行的研究指出，透過在抗議活動時創造的團結資源，確實可以克服危機。如同佔據廣場的長期罷工、佔領工廠運動，或是失業者的示威遊行都展現了反財政緊縮運動的抗爭特性。而其確實也被分析為一種對危機的反應，創造了創新的思想與做法。在葛蘭西(Gramsci)的「有機危機」(organic crises)中，即統治階級的霸權(hegemony)危機指出，在某些政治與社會的條件下，地方的好戰份子會聚集起來使社會運動的規模更大。

> 結語

總結來說，階級的結構主義式觀點容易忽略政治機會斡旋社會經濟的影響與動員資源的過程，而這是社會運動研究所主要關注的重點。將社會運動與(批判)政治經濟作連結，對於掌握社會運動的變化性、強度、時機至關重要。而這些社會運動在世界不同的地區中動員起來，在不同的時間性(temporalities)中反對新自由主義下資本主義的危機。為了達到這一點，社會運動理論應該多去參考對於資本主義轉型的批判分析，以研究當前資本的累積以及剝削的過程。同時，資本主義結構上的轉型分析也可以受益於社會運動理論：它引起了人們不滿情緒下的動員。■

來信請至 Donatella della Porta
<donatella.dellaporta@sns.it>

> 向非洲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 Samir Amin致敬

Vishwas Satga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經濟與社會 (RC02) ,勞工運動 (RC44) 研究委員會委員。

Samir Amin 於北京,2016。
來源: Flickr. 保留部分權利。

Samir Amin於2018年的8月12日辭世。如果沒有他的貢獻,20世紀的非洲就不可能完成這一段輝煌的歷史。他一生學術的旅程穿插了幾個建立現代非洲的重要事件:(1)阿拉伯民族主義(Arab nationalism);(2)在非洲後殖民時期的轉變,這包括了非洲社會主義(African socialism)和科學社會主義(scientific socialism)的興起;(3)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下母國利用從屬國對其的依賴性所進行的控制;(4)結構性的調整背景下所導致的泛非主義(Pan-Africanism)失敗還有冷戰;以及(5)全球化下非洲的塑成。Amin曾經經歷過這些重大事件,而他除了研究這些事件之外,還明智地參與其中。

Amin作為一個獨立的馬克思主義者(independent Marxist),研究計畫進程是以他關注於未開發理論與其機制的哲學博士論文(1957)為基礎。勞資關係博士論文後來出版成《世界規模的累積—未開發理論的批評》(1974)(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一書。Amin是個超越一般常理的知識份子,從不被既有的規則綁架。他是開拓許多理論的先驅,這包括:馬克思主義(Marxist theory)、世界體系分析、發展理論、全球地緣政治(geopolitics)的局面分析、策略建議,以及不斷地重新審視社會主義的案例。社會學界從Amin的學術貢獻中獲益良多,除此之外也有許多領域也是從中獲益,像是:經濟學、國際關係、後殖民理論、發展研究,以及許多各式各樣的學科。在非洲的學術背景之下,Amin在非洲與他人聯合創立了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委員會(CODESRIA);而在1973年他擔任了其中的創立執行秘書。從這個機構誕生了至少三代的社會科學家,對非洲社會科學組織的進程作出了重大的改變。

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Amin並未臣服於學術的正統思想(orthodoxy),他研究馬克思的方法是向馬克思學習。馬克思對他而言只是個出發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方法要求:「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回應當代的挑戰」,這需要對馬克思理論中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以及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做出觀念上的創新。關於這點,Amin並未以強調勞資關係的抽象定義來研究資本主義。對Amin而言,這樣的研究取徑往往落入經濟主義(economism)與階段主義(stageist)的路徑去處理邊陲地帶的進程議題,也就是說「落後的邊陲地帶」必須趕上先進的核心地區。相對地,他認為重要的是將資本主義思考為一個世界體系,使其成為一個分析的基礎單位,但又同時擁有最高層次的抽象概念。而這需要對資本論有歷史性的了解;對現代的帝國主義有具體的分析,以及局勢分析(conjunctural analyses)的應用。最終,這使得Amin開創了馬克思思想中的新觀念,將其應用於全球下的資本主義。他開創的觀念包含:帝國租金(imperial rent)、不平等發展(unequal development),以及世界資本主義本身

>>

存在的全球極化(global polarization)現象。他帝國主義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全球化時期的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其中有五種實踐壟斷資本的利器:大規模毀滅、科技、資金流動、地球資源以及通訊傳播。從這種觀點來看,邊陲國家要「趕上」核心國家就是一場騙局。

全球化發展下,不論是全球南方或全球北方國家,都在努力應付去殖民化帶來的難題。以此看來,Samir Amin對於非歐洲中心論的馬克思主義(non-Eurocentric Marxism)所付出的學術貢獻既重要又前衛。對那些對去殖民化研究有熱誠的人,他也給予了一些用來推翻馬克思主義全屬歐洲中心思想的對話基礎與橋樑。Amin挑戰了在歐洲中心主義當下的馬克思,包括資本主義的史學史(historiography of capitalism),以及西方的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為了達到這個目標,他提出了「官僚納貢生產」(tributary mode of production)的新概念,同時將這種概念類別運用到史實上列出一種歷史序列,說明在過去歐洲如何做為前資本主義文明進程的邊陲。歐洲是文明化的後進者,由於歐洲曾經歷過多樣的制度變化,從封建制度(feudalism)一直到資本主義,而這個過程破壞資本剩餘的集中,使得歐洲以我們所知的方式在發展。此外,歐洲不是因為白人優越(white genius)以及例外主義(exceptionalism)才發展起來,而是有一些歷史上的偶發事件牽連翻轉了十六世紀的世界體系。Amin也藉由處於資本主義邊陲地帶上的勞工與農民聯盟的向心力,挑戰了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其與經濟主義的交疊模式。在馬克思的階級分析與政治學上,不應小看無產階級工人的政治作用力。此外,Amin早期的先見之作:Empire of Chaos (1992),預示了美國領導的歐洲聯盟以及日本會馬不停蹄地擴張、複製其資本市場,更是強調其為了去殖民化所需要履行的責任。

Samir Amin對於脫鉤(delinking)的策略性觀念,與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autarky)無關,而是提供許多國家與地區一個國家—人民計畫的基礎,以確保當前有關主權的計劃立基於去殖民化要求。因此對Amin而言,核心計畫控制了處於邊陲地帶的國家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而Amin並不贊成調整全球壟斷與中心化之間的關係。就他的觀點看來,自由化所帶來的如控制、私有銀行,以及全球農業等,全都不利於國家發展。

脫鉤在本質上是一個國家—人民的計畫,其受到三種傾向形塑:國家極權論者(statist)、資本家(capitalist)、社會主義者(socialist)。Amin想像這些傾向會因階級聯盟(就邊陲地帶的勞工與農民聯盟而言)支持與否而影響了計劃的發展。在這些傾向之間會彼此發生衝突、抵觸、相互競爭,形塑出一個國家—人民計畫的方向。從Amin對於脫鉤概念的新觀點看來,他清楚地說明出脫鉤發生的幾個必要條件。

第一,國家計劃是否能滿足人們需求這點至關重要,而這不應該受到全球資本主義關係的危及。在這方面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Amin在政治上明智地支持了土地均分者(agrarian)的觀點,農夫、小農與消費者應有權控制食物體制。從1996年開始,一個擁有超過兩億會員同時為地球上最大的農民運動網絡「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一直以來都站在提升糧食主權的最前線,去回應全球糧食體制下的壟斷控制對人民帶來的剝削。Amin相信瞭解糧食主權對於了解脫鉤策略而言是必要的。糧食主權位於如此的架構上,對於生處於這個高溫世界的我們而言,思考如何減碳也是相當重要的。

第二,脫鉤發生必須在一個區域或子區域的範圍。對Amin而言,國家像是一個脫鉤發生的重要軌跡,而這必須建立在大型政經聯盟建立關係的背景下。例如,在南非或西非,甚至是在整個非洲裡。這種和諧的區域化安排也與建立內部必要的權力去控制與全球資本主義的關係相關。這代表著脫鉤也與一般受統治階級、全球壟斷、美國為首領導的三巨頭連動的全球化有關。

第三,脫鉤也與世界體系中實現的脫離核心權力有關。這種觀念與脫鉤緊密結合,對於多中心世界(polycentric world)的事實承認相當重要。這樣的想法期望權力能夠透過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被重新分配。在Amin的年代,1955年至1975年期間,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對於實現這樣一個多中心世界至關重要。然而,經歷不結盟運動的失敗以及第三世界團結上的消減,Amin在他的餘年開始創立人民與勞工版本的的第五國際(Fifth International)。Amin開始批評世界社會組織(World Social Forum)的能耐,同時尋找一個能成為國際團結的新基礎。他的計劃被嚴肅對待,與許多部份都有關連,包含了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右翼(right-wing)威脅、全球資本主義正在惡化的系統性危機,如氣候變遷。

在非洲的背景脈絡下,我們那些深曉Samir Amin並與他的思想對話進行思考的人,正因他的隕落而受到極大的挑戰。Issa Shivji,一位領導非洲社會科學的學者,正是以這句話獲得了這種真實感:「猢猻木已經倒了(A Baobab has fallen)」。■

來信請至 Vishwas Satgar
<Vishwas.Satgar@wits.ac.za>

> I. Wallerstein:
一個傑出的社會學家、知識份子

Sari Hanafi, 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 黎巴嫩, 國際社會學協會主席(2018-2022),
Stéphane Dufoix, University of Paris Nanterre 及 Institut universitaire, 法國, ISA歷史學史 (RC08) 研究委員會委員。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位於聖彼得堡的歐洲大學,2008。Alexei Kouprianov/ Creative Commons 攝。

在過去幾個月,有許多事件重創了我們的社會學界。三位卓越的社會學家辭世:Immanuel Wallerstein、Aníbal Quijano、Erik Olin Wright。而國際社會學協會(ISA)特別地感謝曾在1994年至1998年擔任過學會主席的Wallerstein。他是全四卷的著名傑作《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一書的作者。這本書提供了一種重新思考主流現代化理論的世界體系分析,這種分析觀點不論是在他開始創作的1970年代當時,或是到現代都是令人相當佩服。Wallerstein透過論辯經濟、政治、社會文化(sociocultural)並不是社會行動(social action)的自發性領域,以及要求所有的分析需要同時擁有歷史性與系統性,他重新聚集了與比較史學(comparative history)、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資本主義(capitalism)理論相關的社會學觀點,建

>>

立反帝國主義(anticolonial)與後殖民社會學(postcolonial sociology)的理論基礎。

他對機構所付出的極大貢獻是在於「開闊」ISA。他開始了由會長寄信給成員的傳統,建立了其與會員的直接聯繫;同時也組織了地區會議,以培育未來可以領導自己國家社會學發展或是領導ISA學界的社會學家。

Wallerstein的著作已經翻譯成多種語言出版,證明了他的影響力遍及全球。在阿拉伯世界中,他的其中五本著作與一些文章已經過翻譯,而他一位對於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ist)有所研究的朋友Samir Amin,譽他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這種情況真的是難以解析。乍看之下,在幾本他重要的著作中,像是:《否思社會科學》(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1991),或是1996年他主持的古爾本吉安委員會(Gulbenkian Commission)裡他對於重建社會科學的報告之中,會被他引用文獻的非西方社會科學家非常少(Samir Amin先是被引用,而Engelbert Mveng較晚被引用)。然而,更密切地調查可以發現,他在賓漢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負責的費爾南德•布勞德爾研究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曾經是幫許多來自現代/殖民組織(Modernity/Coloniality group)的拉丁裔美國社會科學家(像是:Aníbal Quijano、Enrique Dussel、Walter Mignolo、Ramón Grosfoguel),在1990年代為其提供一個避風港,讓他們出產學術作品的一個地方。此外,在第十六屆舉辦在蒙特婁(Montreal)的國際社會學大會前,他於1998年所作出的會長致詞之中可以看見他第二次(總共六次)對於傳統文化社會學(culture of sociology)作出的挑戰,其中詳盡地引用埃及裔法國社會學家Anouar Abdel-Malek(註一)的作品,去挑戰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

早在1971年,Wallerstein就認為建立在十九世紀初的規訓劃分是「不再帶來任何啟發知識的效果(註二)」,也因此Wallerstein要求以人文與歷史重新組織社會科學。他接受「理性涉及了道德政治(moral politics)的選擇,而知識份子的階級角色是為了闡明我們歷史上共同經歷過的選擇。」,並以此去推動社會科學的重建,就像他在《當我們知道世界的終點:二十一世紀的社會科學》(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Social Science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書中所說過的那樣。他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堅韌的理性」,社會科學將變得與社會失聯。他在2019年1月的最後一段評論中,曾告誡我們沒有人是局外人:「世界將可能走向歧途,也或許不會變成這樣。在過去,我曾認為階級鬥爭(class struggle)是一段重要的抗爭.....那些在未來會繼續活下去的人可以做的是與他們自己抗爭,如此一來改變將會成真。」

Wallerstein相信資本主義末期會帶來的危機,然而這位傑出的學者卻在我們實現更好的世界之前長遠地離開了我們。■

註一:Wallerstein, I. (1999年1月):「社會學的遺產,社會科學的承諾」《當代社會學》(*Current Sociology*) 47(1): 1-37。

註二:Wallerstein I. (1971年11月):「這裡沒有任何一點像社會學的東西」《美國社會學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6(4): 328。

來信請至:
Sari Hanafi <sh41@aub.edu.lb>
Stéphane Dufoix <stephane.dufoix@wanadoo.fr>

> I. Wallerstein: 使社會學重新團結

Frank Welz,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澳洲, ISA社會學史 (RC08), 社會學理論 (RC16) 委員會委員,
Anand Kumar, Senior Fellow, Nehru Memorial Museum and Library, New Delhi, 印度。

「**他將他的首要任務置於成為一位積極參與的社會學家上,而這不僅是作為一名研究員,更是在於成為一名社會學老師。**」

反思2018年ISA世界大會「加拿大學者對於社會學的回顧」的一文中,Frédéric Vandenberghe及Stephan Fuchs曾經強調「社會學已經消失了。」對他們而言,就像一個支離破碎的學科失去了自身的核心跟身份。在這世上,一直以來最反對社會學破裂與專業化的人就是Immanuel Wallerstein。他於2019年8月31日辭世,享壽88歲,他的離開對社會學界而言是一大損失。現在,一個重大的責任正傳承到我們身上:一個全球的社會學家社群,但幸好這裡有他留下的大量學術遺產。在1970年代被Immanuel Wallerstein的核心思想激勵到後(此時Anand Kumar還正在賓漢頓大學接受他的指導),經過了長時間一連串的會議(在1999年我們在巴黎還一起對他進行視訊訪談(註1))。在這篇文章中,我們會從Immanuel Wallerstein的思想裡,挑出幾個我們覺得跟現代社會學最貼切的部分提出。

第一,有關分析的單位:國際社會學曾在這個新世紀之中譴責社會學的方法論國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像是U. Beck, D. Chernilo),然而Wallerstein卻早已在1960年代,當他發現無法將後殖民時期的西非視為一種國族社會來,而只能將其當作的一塊世界體系中的歷史時,改變了他對部分社會科學的分析。這個想法的出發點就在於他創作出了全四冊的作品「現代世界體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第二,Wallerstein在早期曾要求建立與我們理解社會的方式(認識論(epistemology))相關的社會科學,如今這個想法對社會科學而言是既重要又充滿前途的挑戰性。受到Ilya Prigogine複雜性科學(science of complexity)的啟發,在1990年代Wallerstein開始爭論,歷史世界中對於不穩定態、演化論、波動性進行複雜研究所產生的均衡性(equilibrium)的新觀點所建立的世界觀,會取代強調重複性、穩定性的牛頓式世界觀,透過這點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會在社會科學中開啟知識的新領域(將社會學帶回矚目的焦點)。從這種觀點看來,新古典主義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對於均衡理論的判斷將會是錯誤的。除此之外,我們將經濟(經濟學)、政治(政治科學)和社會文化(社會學或人文科學)等領域分開的傳統作法也是一種錯誤。分析一種現象必須連同其如何受到其他現象影響的相關形塑納入考量。舉例來說,種族因素不能被簡單地視為一種文化上從過去繼承而來的關係,要知道的是其同時也是一種在社會中,上層向下層施壓的策略方式,上層以此方式(經濟上)組成了下層階級,也使其形成(政治上)由下而上的抵抗模式(註2)。第三,在Immanuel Wallerstein強調社會學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以及本體論(ontological)的假設背後隱藏的意義,就是他對於要增進我們社會學界團結與效率所許下的承諾。早在1990年代任職ISA主席時,他就批評過社會學界不斷分裂成小團體的現狀。唯一解決的方式只有重新思考如何在社會學界中共同分享這些知識資源。

最後,他將他的首要任務置於成為一位積極參與的社會學家上,而這不僅是作為一名研究員,更是在於成為一名社會學老師。為了達成他的理想,他成為了一名「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並持續地參與為正義與和平發聲的社會運動。從1960年代的反戰運動到1970-1980年代的反種族隔離運動,還有聚集了非洲、拉丁美洲學者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都能看見他的身影。簡單來說,Immanuel Wallerstein將會被作為一位偉大的學者紀念,如此作的原因不只是因為他在1960年代時勇敢反抗「西方式社會學」的限制,更是建立一套新的觀念、理論、研究方法(「世界系統」的研究途徑)復甦了下半世紀的社會學,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人類社會的動態變化——特別是在「漫長的十六世紀」以及那個充滿動盪的二十世紀。■

註一:1999年Anand Kumar和Frank Welz 採訪 Immanuel Wallerstein的影片,https://www.youtube.com/playlist?list=PL49D592A64200367F。

註二: Kumar, A. and Welz, F (2001) "Culture in the World-System. 採訪 Immanuel Wallerstein. Social Identiti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ce, Nation and Culture* 7(2): 221-231。

來信請至:
Anand Kumar <anandkumar1@hotmail.com>
Frank Welz <frank.welz@uibk.ac.at>

> 移民露營車在中美洲的遷移策略

Veronica Montes, Bryn Mawr College, 美國

墨西哥城耶穌馬丁內斯體育場的移民。
來源：Veronica Montes.

2019年5月的一個春日午後，我再次看見露西亞和赫克托，這是六個月來第三次見面。這次，他們是在美墨邊境的提華納(Tijuana)。露西亞和赫克托是數千名來自中美洲移民之一，他們於2018年10月或11月越過墨西哥領土，成為所謂的中美洲露營車的一分子。移民者使用這輛露營車作為到達美墨邊境的一種遷移策略。2018年11月5日，這天是我第一次見到露西亞和赫克托，當時我在墨西哥城參觀體育場，此體育場為露營車上數千名參與者提供庇護的地方，這群參與者是從11月3日陸續抵達墨西哥城。

10月12日，第一輛露營車從洪都拉斯的聖佩德羅蘇拉出發(2018年總共有四輛車)，並於11月12日抵達墨西哥的提華納。中美洲移民者為了要去美國而越過墨西哥的領土並不是什麼新鮮事。根據中美洲移民運動(MMM)的協調員瑪爾塔·桑切斯·索勒(Marta Sánchez Soler)的說法，每天大約有八百至一千名中美洲移民進入墨西哥。據估計，如2014年，大約三十九萬兩千名中美洲移民越過墨西哥的領土，這一數字在2015年略為下滑，降至三十七萬七千人。如果中美洲移民橫渡墨西哥的領土不是一個新現象，那為什麼移民露營車在國內和國際上都引起如此大的關注呢？人權組織表明，大規模挾持綁架對在墨西哥的他國移民成為永久性且大規模勒索體系。瑪麗亞·多洛雷斯·帕里斯·蓬波(María Dolores París Pombo)在她的《墨西哥的暴力和移民》一書中斷言，在墨西哥南部與北部邊界間的遷徙途徑中，他國移民在犯罪與性交易市場中遭嚴重剝削。在這種背景下，成千上萬來自中美洲的移民有名的策略是依靠其流動性，在墨西哥領土內旅行，藉此讓讓他們能夠以安全、經濟許可且快捷的方式到達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的邊界。因此，儘管成立露營車隊作為穿越墨西哥領土的機動性策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其綜合的因素卻與以往不同。首先，迅速加入露營車隊的人數眾多且有異質性，其包含年輕家庭、單親家庭、年輕的單身男子、無人陪伴的未成年者、性少數以及大量的老人與殘疾人士。第二，此組織發展很迅速。第三，有成千上萬的中美洲人下定決心要通過主要幹道，並要求他們有自由和安全過境的權利。

然而，為什麼這群人要離開家園，並冒著家人的生命安全前往美墨邊境呢？事實上，答案很複雜，因為每個中美洲地區的國家都有其自身的歷史背景。國際救援委員會最近發表一份名為「設計混亂：美國在中美洲製造的緊急事件與實際危機」的報告來闡明導致移民的背景。該報告指

>>

試圖讓移民了解自己的權利和選擇。
來源:Veronica Montes.

出,到達美國的薩爾瓦多庇護者帶著嚴重的社會心理壓力,其壓力是世代相傳,如家庭遭受數十年的內戰、國家暴力、貧困、自然災害以及最近遍及各地的幫派暴力。瓜地馬拉也經歷著相似的歷史發展脈絡,從1960年到1996年總共進行36年的內戰,死亡人數約為20萬人,其中多數人為原住民後裔。而洪都拉斯的轉折點則是高程度的政治腐敗,2009年政變、極度貧窮與極端的幫派暴力導致成千上萬的洪都拉斯人逃離自己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數百萬中美洲人的生活變得極其危險且貧窮。

11月11日,來自第一批露營車隊的300人陸續抵達提華納。根據位在提華納的研究機構北境學院(COLEF)的一份報告,估計約有六千人住在市政府提供的綜合運動場。在12月13日公開的報告中,COLEF為在提華納的中美洲移民討論出五種可能的選擇:(1)去美國尋求庇護;(2)在墨西哥申請難民身份;(3)留在提華納並尋找工作;(4)自願回國或強迫遣返其原籍國;(5)偷偷越過美墨邊境。在此列表上,我加上第六種情況:搬到另一個美墨邊境的城鎮。最後一種選項正是盧西亞和赫克託的選擇。第二次遇見露西亞與赫克托是在2018年11月下旬的提華納,當時他們將要離開提華納前往塔毛利帕斯州的雷諾薩(1112英里的旅途,前往墨西哥最危險的邊境城市之一)的數個禮拜前,他們希望能夠在那座城市獲得建築相關工作。

我們能夠從2018年露營車隊的行動獲得一點教訓。首先,作為一種流動性的策略,露營車隊代表著成千上萬中美洲人越過墨西哥領土的可見性,以及這群滯留在美墨邊境的移民的隱藏性之間的雙重性。第二,雖然加入露營車隊並集體動員是幫助人們到達美墨邊境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但時至今日,隨著人們分散到提華納或墨西哥的其他邊境城鎮尋找自己的生存之道時,集體動員也隨之消失,這使露營車隊的成員處於高度脆弱的處境。第三,露營車隊向世界揭示中美洲地區存在的遷徙危機,跟據估計,到2019年底,到達美墨邊境的中美洲移民人數可能達到100萬。第四,因為來自中美洲的移民危機,墨西哥政府面臨著複雜的困境,因為墨西哥南部邊境沒有足夠的基礎設施,無法照顧成千上萬的移民(來自中美洲、非洲人、古巴、海地或其他跨大陸移民),這群人困在那裡等待繼續前往北部邊界,同時,在墨西哥北方的邊境,移民庇護所人滿為患,成千上萬的移民設法到達此地並等待著過境美國以尋求庇護,或者在最壞的情況下秘密入境美國。最後,時至今日,成千上萬的中美洲移民在墨西哥和美國都面臨不確定性和脆弱性。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得益於個人和民間社會組織的憐憫、團結與同情心,這些人的支持與幫助讓如露西亞和赫克托等人尋求更好的生活。■

來信請至:Veronica Montes
<vmontes@brynmawr.edu>

> 紐約州水牛城：實踐難民安置的典範

Ayşegül Balta Özge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thnicity, Race and Immigr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美國, 遷徙社會學(RC31)

伊利縣：2008年至2016年移民和難民來源國前14名

Country of Origin	Total Number (2008-2016)
Afghanistan	140
Burma	4,057
Bhutan	1,888
Burundi	79
Congo	56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958
Cuba	96
Ethiopia	77
Eritrea	321
Iraq	1,322
Iran	54
Somalia	1,851
Sudan	176
Syria	280

布法羅簡報，2018年2月，公益夥伴關係(PPG)。

自1980年頒布《難民法》後，美國已經建立起完善的難民安置體系。國土安全部與國務院負責協調難民進入美國的手續，而衛生與公共服務部的難民安置辦公室與九個志願服務機構共同協調難民抵達後所提供的服務作業。在近幾年川普總統大幅調降收容難民人數以前，美國一直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國，每年接納約九萬名難民，而難民會被永久接納並迅速獲得美國公民身分，且與其他類型的移民身分不同，難民身分立即享有獲得現金補助和醫療援助的資格，還有其他的公共福利。

> 為什麼選擇中小城市？

上文提及的九個志願服務機構與國務院已經達成合作協議，而機構的代表也會經常開會來審核每一個入境難民的案件。他們會考慮如美國已經存在的家庭體系、口譯員的可用性、住房提供、英文等級與就業服務等因素來決定每個難民將安置在哪裡。儘管紐約與洛杉磯等這種大城市是典型的移民目的地，但最近越來越多的中小型城市成為難民安置的首選，較小的城市比較能夠負擔難民，因為有更多閒置的住房，且許多城市因經濟因素而需要增加勞動人口。

自2006年開始，越來越多的難民在紐約州的水牛城這座中型城市定居，儘管安置的過程在一開始就充滿挑戰性，但現在的水牛城已經成為優良的典範，此外，難民對這座城市的複興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水牛城是鐵鏽帶的典型城市，該地區位在美國中西部與東北部，在19世紀與20世紀上半葉以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廠）聞名。因為去工業化、經濟全球化與自動化，水牛城、辛辛那提、克里夫蘭、代頓、底特律、匹茲堡與聖路易斯等城市大量失去居住人口，且經濟產能不斷下降。自1950年代開始，水牛城已經失去一半的居住人口，截至2018年7月，水牛城的人口估計為25.6萬，且貧窮率高達30.9%。水牛城尼亞加拉大瀑布地區是美國種族隔離第八大嚴重的地區，城市與郊區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經濟不平等，與許多其他的鐵鏽帶城市相似，水牛城現在正在經歷的人口遷移，但這主要歸功於移民和難民，若國外出生的人口沒有增加，水牛城的總人口數在2000年至2014年之間的下降幅度將會是4.7%而非3.3%。

自2002年開始，已經有超過一萬五千名難民安置在水牛城。然而，因為二次移民的關係，難民的實際數目應該會更高：最初安置在其他城市的難民因為水牛城可負擔的房租費用與較強的社區支持網絡，而選擇移居水牛城。排名前五大難民的母國為緬甸、索馬利亞，不丹，伊拉克與剛果民主共和國。移民與難民人口集中在

>>

水牛城的西區，至2017年，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上升到16%。

> 誰是主要行動者?

水牛城的四個安置機構(天主教慈善機構、猶太家庭服務、最終旅途難民服務與水牛城國際協會)負責提供難民在美國頭三個月的接待與安置服務。個案工作者在難民抵達前要先找公寓並提供家具，在機場接送他們，以他們的名義開設房屋基本水電設施，幫助他們獲得公共援助與社會保險卡，協助難民的小孩入學，開設銀行帳戶，安排醫療預約，並教導他們如何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此外，安置機構有提供英語課程、就業與口譯服務以及法律諮詢。但是，安置機構沒有從政府獲得足夠的資金來提供90天以上的服務，他們期望在此期間結束時難民應能自給自足。

這四個安置機構並不是水牛城與難民合作的唯一行動者。還有其他的非營利組織，包括難民自身族裔／宗教社區組織、市長辦公室、學校與大學，以及當地媒體，這些組織為水牛城的難民創造熱情的環境。各行動者擅長不同的領域，彼此合作，並在能夠為難民提供更好服務時推薦給他們，正因所有利害關係人有效的合作有助於使水牛城成為移民的典範。

難民不僅僅是需要被滿足的人們而已；在適應新生活後，他們能夠為社區做出重大的貢獻。他們重新安置在較為空曠的社區與學校中，購置房屋並修繕，建立新的事業，維持勞動的生存能力並納稅。與許多振興的鐵鏽帶城市相似，在城市領導人與傳播媒體中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論述：難民對水牛城的復興有利。當然，只有難民本身沒辦法拯救城市，還有如海濱開發計畫與大學醫院聯盟，以及周圍都會區與住宅重建等開發計畫有所增加。然而，難民在水牛城西區因其在經濟穩定和重建的角色而倍受讚譽，其提高社區的多樣性與多元文化意識，並透過企業才能與當地的中小企業來促進經濟的復興。因此，鐵鏽帶城市互相競爭以吸引更多的難民。

> 面臨什麼挑戰?

儘管各團體展開合作來滿足難民的需求，並在水牛城進行城市復興(也稱為「難民複興」)，但融合的過程仍存在眾多挑戰，這都是國家與地方層面的結構性問題。首先，為難民安置機構提供的資金僅限難民移入的前九十天，並期望難民能夠在此階段結束後能夠自給自足，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去年允許入境美國的難民人數上限已降至三萬人，而今年更降至一萬八千人，這導致預算更進一步削減。去年，難民安置機構進行大規模的募款活動，紐約州政府為整個紐約的難民安置機構募款兩百萬美元，但這個計劃的未來尚未明朗。面對難民人數的降低與聯邦資金的削減，城市領導人警告，水牛城的經濟增長將面臨威脅。第二，在川普總統下達旅行禁令後，我在水牛城採訪的敘利亞難民都表達出恐懼和焦慮。儘管他們告知說他們並沒有在水牛城當地遭受任何負面的舉動，但新聞中的恐懼伊斯蘭與反難民言論導致歸屬感的降低。當難民感到不受歡迎時，他們就不太可能融入社會。

此議題在地方層面，則面臨更多樣化的挑戰。水牛城是一個高度隔離的城市，難民通常被安置機構安置在西區。然而，難民通常從事的工作(例如洗碗工、清潔工、廚師、包裝工、裝配工與材料搬運工)卻不在西區。在他們買得起汽車前，他們多仰賴大眾交通工具，而大眾交通工具並不普遍且不可靠。公共援助的資金通常不足以養活難民自身，因此他們可能會運用不規律的時間從事多個兼職的工作，卻使他們無法規律的上英語課程；而大多數難民家庭無法負擔育兒照護服務的費用，除非有其他家庭成員照料幼兒，否則育有孩子的婦女無法上英語課程或上班，這導致婦女在家中與世隔離，並阻礙她們在社會與經濟層面上的融合。最後，許多社區領袖指出水牛城本地出生的人民對難民認知並不多。正因為族群融合是一條雙向道，目前難民仍不足以充分理解美國的生活模式並試圖去適應。

安置世界上少數的弱勢難民不僅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也使接納難民的城市更為豐富並協助城市的發展。紐約州在安置難民上排全國第三，且水牛城安置難民的人數為紐約州中第一。水牛城在過去十五年積累的經驗使其成為其他城市的優良實踐典範。■

來信請至 Ayşegül Balta Özgen
<vmontes@brynmawr.edu>